

陆游

胡海 著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陆 游

胡 海 编著

目 录

在国难中生长·····	5
落榜与婚变·····	16
投身时代洪流·····	24
战和之间浮复沉·····	32
心未太平蜀道难·····	42
从夔州到南郑·····	53
官身奔走·····	63
恃酒颓放·····	76
宦路九折·····	88
扁舟又向镜中行·····	100
新的希望与失望·····	110
绝唱·····	116

提起陆游，人们首先注目的是他头上那顶“爱国主义诗人”的光辉桂冠。“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何等深切的忧民之心！何等悲壮的报国之志！千百年来总是让人那么惊赞，那么感动。尤其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沉沦陷落之际，更是使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不过，如果仅仅把陆游看作是一位为国家统一而奋斗终生的战士，一位为民族大计而奔走行吟的歌手，而看不到这其间包含的扬名显世、自我实现的个人理想，忽略了诗人仕途失意、功业不立的自叹成分，那就是把诗人简单化、理想化了，凌迟、缩小了诗人一生的意义和其作品的意义。

致仕立功是历代文人的第一心愿，忠君报国不过是这个心愿的符合内在伦理观念和外在道德评价的代言形式。传统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最大动力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最后目标是“一朝闻名天下知”，飞黄腾达，封妻荫子。立德自然是虚话，立言也不能直接带来现实利益和在生幸福。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如不能一

帆风顺于仕途，就只能在时代边缘怨天尤人自怜自嗟。他们的诗文便是这种边缘情绪的副产品和派生物，作为文化遗产固然有审美价值，对于作者本人则既非关功利也就不成为目的。但诗文有时能成为扬名致仕的手段，尤其在唐宋，真正被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所以它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具有寄托性和替代性的事业追求。

陆游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功业，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非常可贵的。尤其在国难当头之际，这种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更是时代所需要的，只要它和民族大业相一致。岳飞、宗泽、张浚、王炎等难道没有个人的功名之念吗？但他们是以尽忠报国的形式来实现。赵构、赵昀、秦桧、史弥远等贪图享乐、苛求安定本出人之常情，可是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为代价就是罪过了。南宋偏安一隅，西北强虏虎视眈眈，步步进逼，陆游把个人功业建立在收复故土、洗雪国耻的基础上，所以他的个人追求才具有了爱国主义的高度。

但陆游主要是一个诗人，他并没能够建功立业。所以他心中总是有所失落，并且反复空吟壮志、抒泄这种失落情绪。无论就其才能还是机遇来说他都不大可成为功臣名将，而这正好促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歌手。因为他个人的成败与国家的兴亡是一致的，所以他的诗歌主观上是表现个人意气，客观上却唱出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不论客观上在后人看来如何，陆游主观上是在为自己而活着，而不是在为国家而活着。他的诗首先是个人心迹的表露，而不是爱国精神的讴歌。而且他的生活内容、精神世界是多姿多采的，他的诗词文章也是多姿多采的，不只是忧国忧

民,扶危济世,也有闲情逸致,风花雪月。只有看到这些,而不把目光局限于他头上的桂冠,才能全面地理解他的一生与创作。

在国难中生长

陆游生于宋徽宗赵佶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十七日。他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但出生地是在淮上。那时他的父亲、淮南计度转任副使陆宰正奉旨卸任进京，携家眷乘船路过淮上时，陆游便在舟中诞生。

陆游字务观，据说因为陆游母亲临产前夜梦见了北宋著名诗人秦观（字少游），所以陆宰以秦名为儿子的字，以秦字为儿子的名。陆游早年号热瞒，入蜀后自号放翁。

陆游自称远祖是“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陆通，近祖是唐丞相陆贽。他的老师曾几说他是晋代大诗人陆机、陆云之后。可以确认的先世是陆游的高祖陆轾，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由农家子弟中进士，释耒从仕，先后做过会稽太守、吏部郎中、直昭文馆、赠太傅，以及睦州太守。居官四十年未置田产。后挂冠归隐，修道炼丹。

陆游的曾祖陆珪是陆轾的次子，国子博士。陆珪的次子陆佃是陆游的祖父。陆佃字农师，号陶山，少从王安石学经，是王氏新学人物，但不同意王安石新政，后入元祐党籍。神宗时任国子监直讲、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宣讲王氏新学。哲宗时任礼部尚书，修撰《神宗实录》。徽宗时为吏部侍郎，

修《哲宗实录》。曾出使辽国，归来写有《使辽语录》，拜尚书左丞，赠太师、楚国公。因受蔡京排挤，又名在旧党之籍，故罢为中大夫知亳州，不久去世。陆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成为陆氏家学。他也长于诗文，尤其是七律甚工。

陆游的父亲陆宰，字元钧，号千岩，继承陆氏家学，也工于七律。徽宗政和中做过淮西常平使者，宣和末为直秘阁、淮南计度转任副使。此时出生的陆游，是他的第三个儿子。陆游的大哥陆淞，字子逸，号云溪，后来官至辰州守、天台宰，晚年病归山阴。陆游的二哥陆濬，字子清，号次川逸叟，后来知岳州，赠太尉。陆游十四岁时又有了一个小弟弟，名叫陆洙，字仲虚。后来做过泉州、严州通判。

陆游在这样一个仕宦世家、书香门第所受到的影响是非常良好的。陆佃、陆宰作为富国强兵、锐意革新的王学的传播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陆游，使他始终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爱好诗文的家风培养了陆游的诗人气质与才能。他将来的生道路——由荫或科举踏上仕途，也是由这样的家世基本确定了的。不过，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家庭影响对于陆游的人生来说只是最初的和次要的，他更多地受到来自社会的种种具体而深刻的影响，使他的一生打满了时代的烙印。

就在陆游出生的这年冬天，北方的女真人建立金朝，发动大军南侵。当时宋王朝政治腐败，军队也腐朽到毫无战斗力的地步。十二月，金人占领燕山府（今北京市），随即进攻太原。宋徽宗赵佶惊惶失措，将政权交给太子赵恒，自己一径逃到镇江。赵恒称钦宗，改元靖康。他本来也准备逃跑，但

因为禁军都有家眷，不肯跟他走，他便割地赔银和金人议和。金人一度退走，不久又卷土重来，包围汴京。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将徽宗、钦宗父子连带他们的亲眷一并掠走，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靖康之耻”。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时任兵马大元帅，不在汴京，故得幸免。他从河北逃回南京（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即帝位，改元建炎，是为南宋高宗。金兵继续南侵，高宗不敢抵抗，十月逃往扬州，建炎三年二月自扬州逃到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赵构迭次遣使向金朝称臣请降，也没有制止住金兵的南侵。建炎三年冬，金兵陷建康，侵入长江以南地区，直趋临安。赵构乘船下海避难。金兵穷追未获。江南人民奋起抗金，迫使金兵于建炎四年二月北退。赵构回到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次年改年号为绍兴元年。绍兴二年五月，他回到临安，定临安为都。

在金兵进逼东京的时候，陆宰的官职是京西转运副使。金兵退后，御史徐秉哲弹劾他转运不力，陆宰被免职。此际金兵再度攻打开封，陆宰携妻带子逃到寿春（今安徽寿县）。1129年10月金兵攻陷寿春，陆游全家仓皇逃难。情势之险恶，正如后来陆游诗中所回忆的：“我初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经历了千辛万苦，陆游一家回到山阴鲁墟故居，但金兵攻到长江以南了，鲁墟靠近官道，无山寨可守。金兵的铁蹄在山阴卷起了漫天尘土，陆游一家只得再度奔逃，来到东阳（今浙江金华）陈彦声家。陈名宗誉，是一个“其义可依、其勇可恃”的义军领袖，在宣和、建炎中曾两度组织地方武装，保卫乡土。陆家来后受到陈彦声殷勤招待，一住

三年，直到赵构建都临安，大局略定，才重返山阴老家。“避胡犹记建炎年”，这次逃难给小陆游留下深刻印象，在他心中埋下了复仇雪耻的种子。

绍兴十年（1140年），金兀术大举南犯，被吴玠、岳飞等打得大败而逃。尤其岳飞的岳家军追击金兀术直到朱仙镇。但赵构、秦桧怕岳家军壮大起来成为南宋政权的威胁，也怕二帝回来自己无立足之地，所以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令岳飞退兵，使岳家军的所有战果都付诸流水。绍兴十一年（1141年），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十二月与金人订立可耻的绍兴和议，从此南宋向金称臣纳贡，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以北的广大地区都沦于金人之手。秦桧卖国有功，做了宰相兼枢密使，总管军政大权，而主战爱国人士如胡铨、赵鼎、李光、曾开等则被罢斥。南京小宋廷苟安享乐，如林升诗所指出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再也不想收复失地。

面对这样的情势，凡是稍具爱国良心和民族自尊的人莫不痛心疾首。陆宰一直奉祠（空衔无实职但领俸禄）家居，既不满朝政，也就懒得再出山林了。陆宰的好友李光、周侍郎、傅崧卿等都是抗战派，受秦桧排挤打击。他们谈到二帝被掳，谈到金兵肆虐，谈到黎民涂炭，谈到秦桧误国，人人咬牙切齿，扼腕叹息，痛哭流涕，怒发冲冠。这一切既使陆游感到热血沸腾，又使他感到沉重抑郁。从这些人的言行中，他开始懂得了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并暗暗立下了英雄誓愿：“儿时祝身愿事立，谈笑可使中原清。”

往来于陆家的，除了爱国的政治家外，还有许多文人学

者，他们是渡江南来的“故老”，继承了北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等大家的革新传统，而在文学与学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他们和陆宰秉烛清谈，如数家珍地论说着诗文的系统派别，修辞的利钝得失，对陪坐一旁的陆游启发很大。陆游能够听到这些学有本原的文人学者们谈诗说文，自然获益匪浅，所以他十二岁便能诗善文了。

陆游打小就爱学习，好读书，自称“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陆家藏书甚丰，绍兴十三年（1143年）始建中心秘府于临安，诏求天下遗书，陆宰献书一万三千余卷，可见其多。这给陆游的学习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再加上父亲能够随时指点，陆游打下了扎实的学养基础。

陆游从师受教是从九岁开始的，家塾教师毛德昭苦学至忘寝食，经史多成诵，这种精神对陆游的治学态度产生了良好影响。十五岁时陆游入乡校，教师韩有功、陆彦远等都是学问、有气节的人物，在治学和做人上给陆游以极大影响。陆游在他们的教育熏陶下，把读书和经世治国的事业联系起来，“读书本意在元元”，“治道本来存简册”，“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因此读书也就具有了格外重大的意义而格外为它所重视：“少年喜读书，事业期不朽，致君颇自许，书卷常在手。”“儿时爱书百事废，饭冷馘乾呼不来。”他的父亲还给他讲“朝制要览”，讲述自宋初以来的朝制因革，扩大和丰富他的经世认识。良好的教育使陆游不仅成绩出色，为人称誉，而且有了非同常人的见识与胸怀。

在陆游少年时代的功课中，诗是一个重要的学习科目。他对诗有特殊的爱好。十二三岁时，他偶然从父亲床上看到一

本陶渊明的诗集，捧起来就读，一直念到天黑，连晚饭也不想吃了。他把王维的诗读得很熟，对岑参也非常推崇。

陆游是个文人，他想救国和建功立业，必须通过仕途。当时进入仕途的途径是科举擢士。宋代考试制度规定年十五以上的举子可以参与考试。所以绍兴十年（1140年）陆游十六岁时，便以荫补登仕郎的资格去临安吏部参加出官的考试。这种考试是为荫子弟未仕官的人特设的，于每年三月上旬举行，当时叫“春铨”。考试内容较简单，考试及格后即可放官。陆游因儿时奔走避兵，得近文字较晚，所以这次出官考试未中。

陆游归来后，发愤读书，十七岁外出从师，从云门鲍季和先生受业，早出晚归。这年他专攻诗文，只是苦无心得，无所进展。这时，他结识了江西派大诗人曾几，给他的生活和创作带来重大转变。

曾几（1084—1166年）字吉甫，祖籍赣州，徙居河南。他曾隐居江西上饶城北茶山寺，故号茶山居士。死后谥文清，故陆游也称他为曾文清公。曾几是当时名满天下的诗人、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爱国志士，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属于抗战派。他的哥哥曾开任礼部侍郎时，一次与秦桧发生争执，拂然说：“主上以圣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圣之所听闻。相公当富国强兵，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一至于此！非开所敢闻命。”秦桧老羞成怒，罢了曾开的官，连带曾几的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的官也罢免了。

曾几罢官之后，去山阴拜访陆宰，陆游遂得与曾几相见，并为其所赏识，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忽闻高轩过，欢喜

忘食眠。袖书拜辕下，此意私自怜。道若九达衢，小智妄凿穿。所愿瞻德容，顽固或少痊。公不谓狂疏，屈体与周旋。骑气动原隰，霜日明山川。匏系不得从，瞻望抱悄悄。画石或十日，刻楮有三年。贱贫未即死，闻道期华颠。他时得公得，敢不知所传。”可见曾几对陆游影响之大。

曾几教陆游作诗，要以现实生活出发，不要停留在蹈袭摹仿前辈诗人语句的水平上。同时，把吕本中的“养气”说传授给了陆游。养气说最早是孟轲提出来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气在这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境界，外化为人的气质、风貌。反映到诗文中，就是一种气势、风格。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文气说”，谓人的秉赋有阳刚阴柔，不可力强而致，文气决定于先天。吕本中则主张文气决定于后天的社会教养。一般来说，人的精神境界和气质是后天养成的，但早期家庭影响更重要，而这往往难以考察而易为人所忽视。至于社会教养、社会经历，主要起定型和强化的作用。比如陆游，生于一个爱国志士之家和书香门第，便兼具了文人气质和志士胸怀。他后来接受王炎邀请从戎南郑，强化了他心中早有的壮气，也强化了他诗文的那种豪放气势。如果陆游仅仅是从曾几那儿接受养气的理论，那对他诗歌创作并无多大帮助，作为理论不能帮助他养气。正因他在奔走奋进的历程中涵养其气，有了广阔的视野和胸怀，笔下自然纵横驰骋气势浩然。这样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养气说的真谛：“绝知涵养与人别，吐气如虹失衰志。孟轲浩然正应尔，当比区区养梨枣。”

曾几教陆游作诗要注意大众化，力避生硬，做到圆熟而合律令，不要奇僻，做到平夷通俗。“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这与杜甫的“晚节渐于诗律细”和“只把平常话做诗”是一致的。所以陆游之诗“清新刻露，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曾几的教导颇有其功。

曾几教陆游学诗要严肃认真、勤奋刻苦。“学诗大略似参禅，且下功夫二十年。君要亲尝狮子乳，法须尽吐野狐涎。”江西派论诗，往往用参禅来比喻，因为参禅是由渐悟达到顿悟的，其间有一个艰苦积累的过程。诗歌艺术的提高，不是几句指点、教导就可以完成的，需要训练、揣摩，熟能生巧。陆游秉承师训，“诗以无日不吟，故体多圆熟”。不过，圆熟的诗与好诗尚不能相提并论，前者只是技巧和形式上的成功，好诗的意境来自对生活 and 事物的深刻体验和精确把握，然后才借助恰切的形式与高超的技巧塑造出来。而许多生活体验不是刻意可求的，是认真生活的人自然而然得来，名句佳篇，虽赖有心人，也是妙手偶得之。陆游每日必吟，刻意求诗，诗不是生活的自然结果而成了主观目标，自然难出太多好作品。陆游到老也不满意自己诗文上的成就：“予昔从茶山，辱赏之语妙。文章老不进，憔悴今可吊。”“天遣放翁老不死，茶山钵袋未曾传。”这固然体现了他的自谦和认真的态度，但就其本心而言还是有感而发的，他诗歌创作的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即就佳作的绝对数量而言，比之李、杜、苏也有明显差距；再就其佳作的绝对水平而言，《示儿》、《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书愤》、《游山西村》、《沈园》、《卜算子·咏梅》、《钗头凤》等，论气势略逊《蜀道难》、《念奴娇·赤壁怀古》、

《望岳》，论情辞婉约略逊《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论语气顿挫、音韵和美，也找不出杜甫《登高》、《蜀相》这样的极品。总之，陆游诗作在上述各方面都超出了一般诗人，可都欠那么一点点火候，这与他的过勤、刻意强求是很有关系的。其实，说到“圆熟”，也只是相较江西诗派险僻生硬而言，他能化险为夷，但择字炼句还没做到杜甫那样以平常话入诗。曾几不是非常杰出的诗人，他在理论上是对江西诗派偏僻理论的矫正，陆游从师于他，纵使青出于蓝许多，也还是受了限制，这是毋庸讳言的。

曾几不仅教给陆游作诗理论，也教他如何欣赏、评论作品。这对创作也是很有帮助的。曾几论诗非常精到、细致。一次他对陆游说，徐俯拟王安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之意而作“细落李花那可数，偶寻芳草步因迟”之句，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徐俯专学陶渊明。陶渊明的诗都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苏东坡知道这决不可以易为望，望是有心，见是天意。徐俯觉得“细数”和“缓寻”都是过于留意于物，所以改了一下，寓意而不留意。曾几的话表明了这样一条诗学规律：融情入景，寓意于物，让景物本身显示作者的情意而传达给读者，而不是作者站出来对读者说话、抒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者退隐到文本之后，零度介入，这样才含蓄而韵味深长。不过陆游的大多数诗是直抒胸臆的，以外在的强烈补内蕴的不足，难怪他老来自叹“我昔学诗未有得”了。这不是悟性的问题，而是陆游心太高，太浮躁，急于表白，而且表白过多，因声即景随意而为，所以大多数诗作缺乏深度，意境空虚。曾几指出王安石的弱点

说：“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门虽设要常关’，‘公尚无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渊明本意也。”王安石这样热衷政治的人，重于思考不重感悟，所以不易做到情与境合，理因物出，而常常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陆游心性与王安石相似，做诗也有同样的特点。这对做诗来说是一种损害，但宜于为文，尤其是政论文。记事、说理也能容许这种直白的强烈的表白。所以王安石、陆游的文章成就都很高。只是陆游作诗甚多，成就也不小，所以掩盖了他文章的成就。

陆游名义上是江西诗派的传人，他也自始至终把曾几视为恩师。但他在成就上超过了江西诗派的所有人，包括曾几。之所以能青出于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江西诗派的许多理论不是盲目接受的，而是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有借鉴又有创新。他对江西诗派的蹈袭前人、字字都问来处颇不以为然。《老学庵笔记》中专有一条嘲笑时人解杜诗是“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作诗“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对以苦吟著称、专事推敲雕琢的孟郊、贾岛也给以嘲笑：“亦莫雕肺肝，吟哦学郊、岛。”“君看郊与岛，徒自残其生。”不以生活为诗，而以诗为生活，这正是黄庭坚的大弊。今天的许多作家，一作成名而为家后，以创作为生活内容，为追求为寄托为手段为目的，却没了真实的生活基础，于是才气渐竭，徒有虚名，也是一个道理。既要雕琢，又要有丰富的生活原料，偏于一端就出不了好作品。陆游不屑于贾岛、孟郊的苦吟，他自己在炼字上似乎又欠了点功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他的名篇佳作在全部作品中比例不高，当是妙手偶得，而非功夫到家。

陆游不仅向曾几学诗，也向他学做人。曾几作为抗战派的爱国志士，其人格也给了陆游良好影响。曾几为官清正，不置家产。陆游一生也是以国事为忧，从不做个人的营生打算。老年住着破旧的草屋，还说“清贫尚愧茶山在，送老湖边有把茅”。曾几与陆游既是师徒，又是知音、忘年好友。他常写一些抗金诗篇与陆游唱和，如《雪中陆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寄》：“江湖迥不见飞禽，陆子殷勤有使临。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官军渡口战复战，贼垒淮濡深又深。坐看天威扫除了，一壶相贺小丛林。”

陆游结识曾几，是他生活和创作历程中的一件大事，“予自年十七、八学做诗”，把从师曾几看作学诗的真正开始。他很珍惜和曾几的情谊，自编《剑南诗稿》时，第一首便是《别曾学士》。“予以诗得名，自公始也”，由于曾几的知遇和教诲，陆游一步步走上南宋诗坛，成为“中兴之冠”的诗人。

落榜与婚变

宋代的科举制度是三年一选士。绍兴十三年（1143年），陆游十九岁时，又逢科举之年。由于曾几的指导，他的诗文有了显著进步，这年他在绍兴府参加了以试诗赋为主的进士科的考试，顺利中选，被推荐到礼部应试。但是，这次他落榜了。“二十游名场，最号才智下”。他不仅为自己尚未用世而着急，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能力来。有些研究者认为是他喜论恢复的文章不得秦桧一派的考试官赏识，这是过于偏爱陆游了。陆游的诗文离他所能达到的高度还很远，所以现在尚未定型、成熟，反而连寻常书生也不如；况他的卓异之处隐于粗浅稚嫩的诗文之中，一般考官是看不出来的。从另一面来说，作为选官途径的考试，不光是看人的文学才能。唐代有“作诗赎帖”的考试规定，即允许考生不考帖经而以作诗代替，因之读书人非常注重诗歌才能的提高。诗文与入仕挂上了钩。北宋范仲淹、王安石改革科举制，认为考试诗赋，以声病对偶定优劣不能反映出考生的才华学识，而主张以经义、论、策考试进士。守旧派则坚决反对。宋哲宗时便采取折衷办法，把进士分为考诗赋和考经义两科。此后便或者都考，或者不考诗赋，始终未成定制。陆游虽然在诗文上已经小有才

华，但以二十弱龄，对于国家大事、民生之计未必有多少见地。考试失败并不奇怪。历代许多有文才的人都在科举制上屡屡挫受，如杜甫屡试不中，蒲松龄也是如此。仅仅替他找客观原因是不公正的。文人与能臣毕竟不是人人可以兼之的。陆游要想由科举进入仕途，就得学习许多诗文之外的东西，有用无用是一回事，总之得按考试的要求来有的放矢。所以这时，“陆游年几二十，始发愤欲为古学”，在经学上有了长足进展，准备下一次再试锋芒。

古人谓人生两大喜事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陆游不得金榜题名，但在二十岁上喜度洞房花烛夜。他的妻子是美丽、温存、多情而有才的表妹唐婉，陆游的母亲是唐婉的姑妈。小两口亲上加亲，恩恩爱爱，生活美满。但是陆游母亲偏偏对这个儿媳不满意，一说是认为陆游迷恋唐婉，“惰于学”，影响前程，但从陆游诗“所冀妾生男”句看，主要因为唐婉婚后久未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陆母要儿子停妻再娶。在那个父母命不可违的时代，陆游、唐婉自然如焦仲卿、刘兰芝一般没有抗争的余地。陆母“数遣妇”，要陆游休了唐婉。陆游既舍不得妻子，又不敢违抗母亲，就在外边弄了所宅子，时时和唐婉相会。但在陆母干涉下，二人终于离婚了。其后陆游续娶蜀郡人王氏，唐婉改嫁赵士程。陆游二十四岁时和王氏生了长子子璣，二十六岁时生了次子子龙，二十七岁时生了三子子修。

他的家庭生活外表看来还是美满的，可失去唐婉的心灵创伤却无法治愈。绍兴二十一年的沈园重逢，在二人心中激起巨大波澜。沈园在山阴城东南四里处，禹迹寺之南，是当

地的名胜。三月五日相传是禹的生日，禹迹寺周围的人纷来游赏，成为节日。这天陆游来逛禹迹寺，并到附近的沈园游玩。恰巧唐婉、赵士程也在沈园踏青。二人相见，千言万语无以诉说，只有默默地分开。一会儿，唐婉让人给陆游送过酒菜来。陆游感慨万千，在壁上题词一首：“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蛟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这就是凄美哀婉、感伤千古的爱情绝唱《钗头凤》。后人为他们的故事深深打动，情不自禁，替唐婉和了一首：“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千秋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瞞，瞞，瞞！”一说是唐婉自和。对于陆游来说，生活中不仅有爱情，还有学业、事业，婚变的痛苦与落榜的遗憾差不多是一回事。可对于唐婉，爱情却是她生活的全部，因为没有别的多少寄托可以分心，她就总沉浸在悲伤中，不久悒郁而死。陆游心灵上不是没有伤痕，而是被许许多多别的东西掩盖着，不时会隐隐作痛。此恨绵绵无绝期，以诗人敏感多愁的心，永远不能忘怀的总是情和爱，其他一切悲欢得失只是暂系心头。感情创伤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为纷繁万象在心中的投影所掩盖，但当人生杂事随老之将至而化为云烟，昔日欢爱与痛苦的印迹就如水落石出，让人最后去忍受和享受。“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作此诗时，诗人垂垂老矣，恋人却依然年轻美丽。人生如梦，只有爱才这般真实，这般刻

骨铭心。陆游一生做诗数量过丰，因此不免题材重复，意境雷同，但他关于沈园和唐婉的多次回顾和反复咏叹，却总是那么真挚感人，不会让人厌烦，而只觉得醇如陈酒。真情就是这样，不会因抒发的次数多而变得淡薄，而只会在不断流淌中日益浓郁。诗人六十八岁有题沈园诗一首：“枫叶初丹榭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恩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龕一炷香。”诗人七十五岁时又作《沈园》二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恋人翩若惊鸿的丽影历历在目，诗人已将化为尘土了，衰朽身躯如同柳老不起棉絮，但仍然有深情的泪水泫然而下。八十一岁时诗人作《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八十二岁时作《城南》：“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来只自伤。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指颓墙。”诗人忠贞不渝、历久弥深的爱，浸透到字里行间，和着一生的希望与失望、欢愉与哀愁流溢出来，让无数读者在感动、忧伤和怅惘中愈加体会到生命和真情的可贵。

婚变之初的痛苦也罢，沈园重逢后的感伤也罢，暮年回首的惆怅也罢，青年陆游还得继续走他的人生之路。

绍兴二十五年（1153年），陆游二十九岁，又逢科举之年。他到临安去参加两浙转运司锁厅试。锁厅试只限于现任官及恩荫子弟应进士科的人参加，录取名额较宽松。通过这一关，

第二年便可参加殿试。陆游此时已经很有些声名，有中头名的希望。可偏偏秦桧的孙子秦埙也来应试。秦埙由于秦桧的庇佑，已经官居敷文阁待制了，但秦桧想买名声，掩盖私心，要让秦埙通过省试、殿试，博取状元及第的荣誉，名正言顺地爬上高位。这样就发生矛盾了，一边是有名的才子，一边是丞相的孙儿，真让主考官陈子茂左右为难。但他是个正直的人，唯才是举，按成绩优选，将陆游擢置第一，秦埙第二。第二年，陆游参加礼部省试，考官为魏思训、汤思退等，陆游考试又名在秦埙之前，不免遭秦桧嫉恨。又因陆游“喜论恢复”，“语触秦桧”，于是殿试中被黜落，陈子茂也“几蹈危机”。陆游满腔热忱被浇了一盆凉水，大受打击，心情沉郁，无可奈何地回到故居，后来他有诗忆及此事：“我年甫三十，出身事名主。狂遇斥不用，晚辟征西府。”书生意气，不谙世事，不识时务，以为只要愿望良好，就能大展宏图。一遭挫折，便觉得报国无门，建功无望，而放浪山水，结交名士，时发忧叹：“匆匆过三十，梦境日已蹙。”科举之路行不通，陆游便幻想以武建功。岳飞就是由一名小小将官而在抗金斗争中成长为一位叱咤风云、威名赫赫的大元帅的，韩世忠、韩琦、张浚等都是凭金戈铁马博得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陆游希望通过杀敌报国来实现雄心壮志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国家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人才。辛弃疾不是也吐露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胸怀吗？在宋金对峙的年代，许多有志青年都会有这个既为个人也为民族、国家的良好心愿。只是，一则当朝并不给这些人以报效君王、实现自我的机会，岳飞的结局就是最让人寒心的恶例。二则以陆游的特长，做

个摇旗呐喊的歌手还可以，驰骋疆场、运筹帷幄不过是文人的幻想。可贵的是他不仅有此幻想，也在努力为自己的幻想添加现实基础。他闲居在家，“好结中原豪杰以灭虏自誓。商贾、仙释、诗人、剑客，无不偏交”。还研读兵书，与人讨论兵法。他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虽然没给他带来预期的结果，但使他活得更加有声有色，使他不断走向新的生活，产生新的诗句。

秦桧为相一十八年，像一座大山，将一切有志之士都压得喘不过气来。绍兴三十五年十月，秦桧死去，高宗的屈服苟安思想失去了有力的支撑，不由不向抗战派这边摇摆过来。朝野人士纷纷议论边事，主张抗金，沦陷区人民也盼望王师北上，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这年十二月，高宗下诏斥退一班奸人，贬谪到偏远地区，而重新起用被秦党压制、诬陷的抗战派。如曾几便被用为提点两浙东路刑狱。整个朝廷开始有了一些清明气象，正派人物开始抬头。陆游兴奋地吟唱道：“棠梨花开社酒浓，南村北村鼓冬冬。且祈麦熟得饱饭，敢说谷贱复伤农！崖州万里窜酷吏，湖南几时起卧龙？但愿诸贤集廊庙，书生穷死胜侯封。”湖南卧龙指张浚，这位抗战派的中坚人物尚未被起用，说明高宗还在摇摆之中。陆游希望张浚如卧龙腾起，喊出时人强烈要求抗金的心声。“书生穷死胜侯封”并非说陆游不想用世，甘守穷庐，而是以此更加强烈地表现“但愿诸贤集廊庙”的良好愿望。正如杜甫“愿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并非真的不计较个人生死只为天下寒士虑，而是因为自己是天下寒士之一，推己及人，天下寒士俱欢，自己不也可免受

冻的惨境吗？陆游心中是把自己当作诸贤之一的，诸贤被起用，自己就有进入国家廊庙的希望了。

这时期，陆游的母亲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去世，绍兴二十六年，四子子坦出生。他的小女儿阿绘是在他三十七岁那年出生的。陆游成了一家之主，建功立业，是为自己，也为家庭，当然也为国家。绍兴二十六年，曾几改知台州，四月先赴行在，陆游作诗《送曾学士赴行在》送行，流露出不得用世的苦恼、焦虑，也表白了他不甘平庸、沉寂的决心：“二月侍燕觞，红杏寒未拆。四月送入都，杏子已可摘。流年不贷人，俯仰遂成昔。事贤要及时，感此我心恻。欲书加餐字，寄之西飞翮。念公为民起，我得怨乖隔。摇摇跋前旌，去去望车轳。亭鄣郁将暮，落日淡陂泽。敢忘国士风，涕泣效臧获。敬输千一虑，或取二三策。公归对延英，请问方侧席。民瘼公所知，愿言写肝膈。向来酷吏横，至今有遗孽。织罗士破胆，白着民碎魄。诏书已屡下，宿蠹或未革。期公作医和，汤剂穷络脉。士生恨不用，得位忍辞责。并乞谢诸贤，努力光竹帛。”恩师被起用，自己空有许多谋策不得进献，朝政有了起色，但积弊未除，自己也只能袖手旁观。在对恩师的期望里，诗人既表示了关心国事的拳拳之心，也表达了参预国事的殷殷之意，暗含对自己前途的无限期盼。

绍兴二十七年，辛次膺为给事中，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被秦桧压制了许多年。陆游既谦逊也满怀自信地给他写了一封《上辛给事书》以自荐。“某闻前辈以文知文，非必巨篇大笔，苦心致力之词也。残章断稿，愤讥戏笔，所以娱忧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于邮传之题咏，亲戚之书牋，军旅官府仓卒

之间，符檄书判，类皆可以洞见其人之心术才能，与夫平生穷达寿夭。”陆游的信心源自他的诗文，他锋芒未试，唯一的资本也就是多年来的作品。他的文可洞见人心术才能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而为了说明这一道理，列举种种事例，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极有说服力。由这篇自荐文足可看出他的文才和分析、判断能力。他引唐人的话“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树为靶子，驳道：“是不得为知文者。天下岂有器识卑陋，而文词超然者哉？”陆游数番落第，都与他长于诗文而短于器识有关。但官方考试所设立的器识标准是有所偏颇的，陆游的器识卑陋文词不会超然的见地很有独到之处。那么能否反过来说是否文词超然者必然器识高卓呢？虽然从逻辑上说这并不成立，只能说擅长诗文者在某些方面有过人才华，但当辛给事在读这篇旁征博引、辩才无碍、气势夺人的文章时，恐怕会同意这一推论。次年陆游的出仕，大概就是这封不卑不亢、入情入理的自荐书起了作用。“贤者之所养，动天地，开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实洋溢，而后发见于外，气全力余，中正闳博，是岂可容一毫之伪于其间哉！”这是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及吕本中“涵养吾光”观点的发挥，也表达了文如其人，以文观人的文艺思想，无论从知人识才还是品诗论文来说都是寓有启迪意义的。辛给事完全可由此文而对陆游的心志、性情、才华一目了然。

不管怎么说，从朝政变化的大势讲，从陆游思想的成熟和才能的具备讲，他都要开始用世，融入时代洪流了。

投身时代洪流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秋，三十四岁的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主簿是县令、县丞之下的小官，事情却不少，掌管簿书，非常繁杂。陆游到宁德后，不堪文书的困扰，滋生了厌倦情绪。他天天和县尉朱景参一起饮酒赋诗，有时也独自出县去玩，“拂床不用勤留客，我厌文书自怕归。”

陆游作为一名心高气傲好幻想的诗人，是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远大志向的，于现处地位很不满意。不过他还是尽职尽责。清《宁德县志》卷三《宦迹·陆游》中说他“有善政”，因此留下颇为“百姓爱戴”的政声。福建路提刑樊茂实想提拔他，以“有声于时，不求闻达”的荐词保举他。但陆游始终没去取荐举的奏状。后来樊茂实看到他，问：“主簿为什么不来取奏状呢？”陆游笑着回答说：“来取奏状，哪能算是‘不求闻达’呢？岂不有负提刑的美誉，因此不敢。”樊茂实哈哈一笑，仍把奏状给了他。但陆游没有投递。樊茂实惜才心切，还是推荐了他，绍兴二十九年秋，陆游改调福州决曹，主管刑法工作，官阶仍然没变。

到福州后，公事很忙，连饮酒赋诗的工夫也没有。陆游对于这种不称心意的空忙很感失落。这年秋天，他忙里偷闲

和朱景参在侯官县北三十里的北岭一座佛寺中约会，共同欣赏秋景，品尝荔枝，对饮畅谈。酒至酣处，陆游作词《青玉案》一首：“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茱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象。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这首词格调高昂，“我老渔樵君将相”似是自贬自叹，其实只是以自谦的语句来掩抑心中蓬勃的豪情，流露出一股不甘平庸、锐意进取的激奋之气。

绍兴二十九年九月，汤思退由右丞相改左。陆游上贺启，于表示敬贺的同时请求荐举自己。“恭惟某官民之先觉，国之宗臣，精义探系表之微，英辞鼓天下之动。至诚贯日，历万变而志意愈坚；屹立如山，决大事而喜愠不见。”“人望所属，国体自尊。今者大明弼亮之勋，正席辩章之任。守文致理，将见隆古极治之时；应变制宜，必有仁人无敌之勇。圣者以此属元辅，学者以此望真儒，行或使之，天所命也。”这些话敬意殷殷，辞藻优美，汤思退会有读到一篇美文和承受钦赞的双重喜悦。在贺启结尾部分陆游表白了自己的心意：“某猥以孤远，辱在记怜。如其少逴衣食之忧，犹能颂中兴之盛德；必也遂老江湖之外，亦自号太平之幸民。穷达皆出于恩私，生死不忘于报称。”陆游既提出了被举用的请求，也表示若不能进身，也为做一个太平盛世的平头百姓而为幸，既有恩私之盼，又准备生死以报，言辞婉曲周致之至，足见其心玲珑百窍。“辱在记怜”似乎口气过于谦卑，但以地位、资历、年龄之差都不为过。当初杜甫献三大礼赋，韩愈有三上丞相书，都是不得不行的途径，无所谓屈辱。汤思退感其心悦其文，自

然乐意荐举陆游。因此，绍兴五十年（1140年），陆游调任临安。他离开福州，由海道到温州，再经括苍、东阳北上。一路心情畅快，有诗为证——《海中醉题，时雷雨初霁，天水相接也》：“羁游那复恨，奇观有南溟。浪蹴半空白，天浮无尽青。吐吞交日月，潏洞战雷霆。醉后吹横笛，鱼龙亦出听。”又有《自来福州，诗酒殆废，北归始稍稍复饮，至永嘉括苍，无日不醉，诗亦屡作，此事不可不记也》一首：“樽酒如江绿，春愁抵草长。但令闲一日，便拟醉千场。柳弱风禁絮，花残雨渍香。客游还役役，心赏竟茫茫。”这两首诗表明诗人心情尚在变化之中，放眼一路景色，胸襟渐展，如雷雨初霁。而《东阳观酴醾》一首，则是轻快的欢歌了：“福州正月把离杯，已见酴醾压架开。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变“赏花”为“摘香”，诗人对一路春光不仅是眼到、心到，连手也要到了。他要拥抱、占有这大好景致、大好光阴。

是年五月，陆游抵达临安，担任敕令所删定官的职务掌管編集公布的法令，纂类成书。当时担任删定官的人多为饱学之士，所以对于陆游来说算是量才录用。虽然这也是个小官，但接近中央，又能结识许多名人、要人，发展机会较多，所以陆游非常看重这一职位，后来称是“忝朝迹”的开始。

这期间陆游积极向赵构上书言事。《望永思陵》诗后自注：“绍兴庚辰辛巳间，游屡贡瞽言，略蒙施用。”弹劾杨存中即是一例。《宋史陆游传》载：“时杨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陈非便，上嘉其言，遂罢存中。”

陆游好交游，这是大多数诗人尤其是豪放派诗人的特性。李白、苏轼、辛弃疾等，走到哪儿都有不少好友。“天下谁人

不识君”，他们需要知音，人们也欣赏他们。陆游在临安结交了秘书省正字周必大、进士王质、王十朋、韩无咎（名元吉）、杜莘老、陈德棠等许多友人。其中数周必大与他交谊最深，以后也维持最久。周比陆小一岁，常常向陆游请教诗法，陆游让他学苏辙。后来陆游做《祭周益公文》，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生活状况：“某绍兴庚辰，始至行在。见公于途，欣然倾盖。得居连墙，日接嘉话。每一相从，脱帽褰带。从容笑语，输写肝肺。邻家借酒，小圃锄菜。荧荧青灯，瘦影相对。西湖吊古，并辔共载。赋诗属文，颇极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坏。各谓知心，绝出流辈……”。这篇祭文平淡得如同他们的交情，然而深挚的情感尽在这些流水式的回忆中流淌出来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俗语是强调其淡，在此陆游却突出了水的久而不坏的特性，而将君子之交的意义提升了一层。由此文可以见出，陆游这一段生活还是比较闲适自在的，而与周必大的相知相投更给他增添了不少欢愉。

不过好景不长，陆游好陈己见，言多必失，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因论事不合，罢归山阴。

这时，天下大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金朝后方的蒙古已经崛起，正在积极扩张；金主完颜亮是通过篡弑手段取得帝位的，为女真内部不服。完颜亮从未放弃过占领江南的欲念，如今为了摆脱蒙古人的威胁和转移内部视线，更是积极准备南侵。秦桧死后，南宋政府中的抗战派逐渐抬头，纷纷要求收复失地，也使完颜亮感到不安，决意压迫以至灭亡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完颜亮迁都燕京，同时着手修复为战火损坏的汴梁，作为南侵基地。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完颜亮命参知政

事李通知宋贺生辰使徐度说二月末金主要到河南观花，然后去淮右打猎。河南指今天的洛阳，与淮右都是南宋领地，金主赏花射猎于南宋境内，用意不言自明。五月，金朝遣使来贺高宗生辰，提出两国由现在的以淮水为界改为长江、汉水为界，要求派金主指定范围内的大臣一位、老将杨存中、郑藻及高宗亲信一人前往南京（开封）与金谈判，同时通知宋朝金主将于九月前往泗州、寿州和陈、蔡、唐、邓等地打猎。金使态度恶劣，并说出钦宗赵桓已死的消息来威胁高宗。赵构愤而回宫，其后指示文武众臣：“今日更不问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

这年九月，完颜亮发动大军南犯了。他一边分遣军队进攻川陕和荆襄两路，一边率同大军六十万，号称百万，直逼渭水清河口。南宋派刘琦率大军沿运河北上迎敌。刘琦是一位名将，绍兴十年曾以四万兵在顺昌大破金兀术的十万大军。他准备在淮阴迎击敌人，可他左翼的王权却很快在皖北合肥溃退，刘琦大军陷入金兵的包围，不得不向扬州退却。十月，完颜亮进驻合肥，高宗抗战的决心动摇了，准备航海逃命。经丞相陈康伯一再劝导，这才下诏亲征。王权一退再退，建康的左翼完全暴露。完颜亮抓住这个机会，随即准备渡江。这时中书舍人虞允文奉诏至采石犒军，鼓动起王权残部，头天冲没了金兵准备渡江的小船七十多条，次日又烧毁金人大小兵船三百余条。完颜亮渡江不成，挥师转攻扬州。刘琦的军队在皂角林和金人遭遇，打了一个胜仗后退至镇江。宋军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兵船，在长江中流巡弋，给金兵一定牵制。南宋军和金人已成划江而守的形势。不久，女真内部的矛盾激

化，东京留守曹国公褒自立于辽阳，即金世宗完颜雍，改元大定。完颜亮部下闻变，杀掉完颜亮，一边派人和南京议和，一边向淮北退却。十二月，金兵全部退回淮北，完颜雍还都燕京。同时南宋的将领也陆续渡江北上，收复淮南州郡，双方仍以淮水为界。

陆游在战争爆发前即被召回临安，先任大理寺司直，旋迁枢密院编修官。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抗金斗争，但一直在幕后紧张活动，并热切关注着战争。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均州乡兵总辖杜隐攻入河南府，收复西京洛阳。陆游闻讯极为兴奋，以兴奋高昂的笔调欢呼这一胜利：“白发将军亦壮哉！西京昨夜捷书来。胡儿敢作千年计，天意宁知一日回。列圣仁恩深雨露，中兴赦令疾风雷。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在《喜小儿辈到行在》一诗中，他以同样的调子歌唱国土的收复：“传闻贼弃两京走，列城专为朝廷守。从今父子见太平，花前饮水勿饮酒”。因为战争胜利，陆游才能享受天伦之乐，使他心情好得饮酒如饮水。三十三年闰二月，陆游的一位兄长赴任去扬州，陆游作《送七兄赴扬州帅幕》：“初报边烽近石头，旋闻胡马集瓜洲。诸公谁听刍蕘策，吾辈空怀畎亩忧。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诗中写到头年完颜亮进逼采石和瓜洲时人心惶惶的情景，对当朝人士能否继续把持大局深表怀疑，对自己人微言轻不能进献谋策只能悬心吊胆深为苦恼。

金兵北退时，南宋没有趁机追击，收复沦陷区，除了老百姓无力继续承负战争，高宗信心丧失、只求偷安等因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南宋国力衰弱，守已不易，又何言攻？所

以在胜利之初，南宋举国上下乘胜追击呼声甚高。赵构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去建康，人心大振。但他很快退缩了，令前线收兵，恢复和议。次年二月返回临安。作为最高君主，他不能凭一时意气赌上一国命运。作为普通人，他只苛求安乐，不愿冒险。但热情正盛的主战派很不满意。赵构在完颜亮南下时起用张浚守建康，金兵北退时，很多人都希望张浚出任江淮宣抚使，担当追击重任。但赵构却委命其职于早已不孚众望的杨存中。于是，朝廷重新爆发了主战与主和之争。给事中、中书舍人等有封驳诏令权力的官员在丞相陈康伯支持下，退回了委任杨存中的诏书。高宗既畏金人，又不能服众臣，心灰意冷，便于这年六月把政权交给太子赵昚，自己退居德寿宫，当太上皇。赵昚即位称孝宗，改明年（1163年）为隆兴元年。

陆游始终是主战的，但从他后来在《贺张都督启》中提出“熟讲而缓行”的主张，又在《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反对冒攻京东来看，他不是只有热情，没有理智。战当战，只是不能盲动，这与赵构的畏金成病、不敢言战是两回事。赵构也不是一味卖国投降，而是客观条件使他不能大有作为，审时度势选择了和。他过于软弱，行为上近似卖国投降，为史家所不齿。公正地说，在南宋朝中，只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分，没有爱国派和投降派之别。《老学庵笔记》卷九中载，杨存中在战争爆发前主张据守长江，待敌势衰颓再击之，而后徐图北进，一反当时多数士大夫列兵淮北的意见。而陆游在《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中提出固守江淮而不急攻京东，与杨存中一样是审时度势反对冒进，是策略问题不是态度问题。史家或传记作者将主战

和爱国等同起来臧否南宋人物是缺乏历史意识的,是以今非古,或是囿于当时人们的情绪之见。这样塑造出的陆游形象,只是文学作品中的陆游,不是历史上的陆游。此外,在这次抗金斗争中的陆游是人微言轻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若以他在后世的文名来推度他当时的作用,以为他若不能作中流砥柱至少也要能推波助澜,否则就不合于其伟大形象,这也是景仰热爱过度。至于为了塑造他的伟大形象而去历史材料包括他的传记、诗文中寻找论据,以至牵强附会,就完全是背学术之道而行了。如有些学者将《书愤》中“楼船夜雪瓜洲渡”一句说成是他在绍兴三十一年参加侦察敌情的战斗记录。试想陆游时任朝中一秘书式的小官,怎么会用得上他冒着夜雪、乘着战船去侦察敌情?该诗作于孝宗淳熙十三年,写到瓜洲不一定亲身到过,即使到过也非在当时。陆游《焦山题名》中载他在孝宗隆兴二年任镇江通判时踏雪登焦山,望瓜洲渡上的战船,慨然尽醉。另孝宗乾道七年也到过这一带,凭吊旧时战场,作诗《过采石有感》。“楼船夜雪瓜洲渡”一句与这两件事有关,并非他亲身参战的记录。他一生没有直接介入战斗的记录。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为诗人某些战火纷飞、刀光闪闪的诗歌表面所迷,是极力要将他塑造为战士——最毋庸置疑的爱国者形象的下意识所致。其实,虽然陆游没有亲自上阵,他不是已经用他的笔投入了抗金洪流吗?这支诗笔的意义,又岂是一把剑一支戈可比!

战和之间浮复沉

孝宗即位之初关心武事，有收复失地的意图。他对于文学也较感兴趣。一天他和周必大谈起李白，问当世有谁可比。周必大说惟有陆游。于是陆游的“小李白”称号传开来，诗名日盛。绍兴三十二年十月，知枢密院事史浩、同知黄祖舜力荐陆游“善词章，谙典故”，召对便殿，赵昚说他“力学有闻，言论凯切，”赐进士出身，破例以文章进用，擢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事修《高宗圣政》及《实录》。

孝宗起用深孚众望的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筹划北伐事宜。南京政府一时弥漫着抗战气氛。陆游也热情高涨，积极上书言事。十一月，陆游作上殿札子三份，其一提出赵昚诏谕不得坚决执行的问题，建议“仍命谏官御史及外台之臣精加考核，取其尤沮格者弃之，不惟圣泽速得下究，亦使文武大小之臣，耸然知诏令之不可慢如此，突圣政之所当先也。”其二针对“承平既久，日趋于文，放而不达，未流愈远，浮虚夫实，华藻善道”的官僚机构现状，建议改变形式主义和义牒主义的作风，“明诏辅臣，使帅其局，”“繁碎重复，无益实事者，一皆省去。”第三份札子劝谏赵昚效法历代仁主“恭俭”、“爱民”，“积德深远”则“卜世长久”，希望看到孝宗皇上

“福祿川至，治效日見，年谷屢豐，四夷章服”，“況中原故地，其有不復者哉。”三封札子，切中時弊，既顯出陸游的識見，也流露出一份拳拳忠君愛國之心。

隆興元年（1163年），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陸游欣然呈上《賀張都督啟》，表示敬意與期望：“……仰惟列聖之恩，突被中原之俗。耕田菑井，舉皆涵養之余；寸地尺天，莫非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緩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不惟眾人引頸以歸責，固亦當虛心而仰成……”“熟講而緩行”是陸游的見解，即不要急於求成，不打無準備之仗。這是在朝野上下一片反攻呼聲中發出的冷靜的提醒。“虛心”也是善意的忠告。所以張浚對陸游頗有好感和敬意，對陸游說：“吾子異時當以功名顯。吾少時在熙河，從事曲琦授兵法，所謂老曲太尉也。今當以付子。”陸游自知只能紙上談兵，婉言謝絕。

這時陸游在朝中是頗受重視的。他有文才，也有主見，又能得體地表達和嚴密地論說，所以常被請去起草一些機要文書。元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和樞密院決定爭取西夏牽制金之右臂，請陸游擬《代二府與夏國主書》，正文說：“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修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災患，相與為無窮之托。中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未嘗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寢歸，會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于天下，是敢輒布腹心于執事，愿留神圖之。惠以報音，當告于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

均一家，永为喜邻，传之万世，岂不美欤！”这封图书，以娴熟的、华美而端严的外交辞令，从远祖的友好邦交起笔，将中间的纠葛轻轻一笔带过，着重表明今朝宋主的结盟心意，申以唇亡齿寒之理，动之以邻国相依之情，基于争取外援的目的，表达永为善邻的良好心愿，确实非大手笔不能为此文，与李白当年醉草吓蛮书有异曲同工之妙。陆游的才能在此充分显示出来。二月间，丞相陈康伯、史浩、枢相张浚欲招谕中原士民和据有州郡的豪杰配合王师杀敌，并鼓动金军将士起义，撰写《蜡弹省札》的重任，自然非陆游莫属。按规定，这类机要文件当由中书舍人起草，可是却请陆游执笔，足见陆游的受器重。他也对此感到无上光荣，后来有诗追忆：“往时草檄喻西域，飒飒声动中书堂。”

张浚作为任在身的主将，积极准备北伐。

他根据“虜兵困于西北”的传言及吴璘在陕甘方面孤军与金相持的情况，拟请赵建“临幸建康，以动中原之心，”并“屡奏欲先取山东，”以援吴璘。左仆射史浩则反对这一孤军深入京东的计划。陆游一直是主张稳扎稳打的，支持史浩的观点，代他作《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进谏：“臣等恭睹陛下特发英断，进讨京东，以为恢复故疆，牵制川陕之谋。臣等获待清光，亲奉睿旨，不胜欣抃。然亦有惓惓之愚，不敢隐默者。窃见传闻之言，多谓虜兵困于西北，不能复保京东，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师若至，可不劳而取。若审如此说，则呆伐之兵，本不在众，偏师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万一未至尽如所传，虜人尚敢旅拒，遗民未能自拔，则我师虽众，功亦难必，而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

犹知出兵京东以牵制川陕，彼独不知侵犯两淮荆襄以牵制京东耶？”这一段，先树起靶子，但不直攻，而先迎合，尽言皇上英断之不仅可行且必成不世之功，但留下余地——这是在传言属实的前提下。而后委婉地举出“万一”的情形——假如传言不实，那么南宋宿师于外无功，内部守备已虚。陆游虽只说这是“英断”不及的“万一”，赵昚自然知道它是很有可能，岂会不明了其利害关系？末句反问相当有力，南宋能想到出兵京东以牵制川陕，金朝自能想到攻两淮荆襄以解京东之围，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话，能站到敌方的立场看问题，预卜其围魏救赵之策，可见陆游还是有一定军事、政治才能的。尤其是他善于论说，围绕中心论点旁敲侧击，迂回婉转，以退为进，愈隐愈显，在与皇上的书面交流中既识大体、有分寸又从容自如、尽言尽意，表现出高超的文才与辩才。这样，他下一段提出的策略——“为今之计，莫若戒敕宣抚司，以大兵及舟师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为不可动之计；以十分之一，遴选骁勇有纪律之将，使之更出迭入，以奇制胜。俟徐、郟、宋、亳等处抚定之后，两淮受敌处少，然后渐次那大兵前进。”——就很容易被赵昚采纳了。从后来的战事看，张浚是接受了史浩、陆游等的意见的，没有进舟山东，而是列兵淮上。只是这时，陆游却不能再参与筹划了，他因言事而触怒赵昚，被调离临安。

事情的起因与经过是这样的：赵昚立为太子前的门人龙大渊、曾觐很得信任，孝宗有意提拔他们，给事中和中书舍人认为龙、曾二人招权纳贿不能进用，孝宗非常不悦，下诏痛斥。陆游一贯主张尊人主、抑权臣，上次论罢杨存中，这

次又想进言去龙、曾，结果撞在风头上。一天，史浩与曾觐应邀参加宫中内宴，有一宫女拿手帕来请曾觐题词。这本是平常事，可是因为最近德寿宫内一位专管果品的内臣和宫娥来往，出了问题，因此曾觐说：“不敢，独不闻德寿宫有公事乎？”史浩将这件事告知陆游，陆游和参知政事张焘来往甚密，又把这件事转告张焘，并叮咛说：“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第二天张焘进见，反映了情况，劝赵昚说：“陛下初即大位，不宜和臣下燕狎，一至如此。”赵昚心中羞恼，问张焘从何处得知。张焘答说他从陆游那里听到，陆从史浩那里听到。赵昚大怒说：“陆游反复小人，早已犯有错误，应该离开临安了。”赵昚不能轻动史浩，陆游官小职微，所以拿他开刀，有杀鸡吓猴的意思。于是这年五月，陆游被出为镇江通判。陆游满腔热情被浇了一盆凉水，不尽余慨，后作《感兴》诗说：“贼亮负函贷，江北烟尘昏。奏记本兵府，大事得具论。请治故臣罪，深绝衰乱根。言疏卒见弃，袂有血泪痕。”他觉得委屈，却不知作了替罪羊。求治心切，进言过急，空有良好愿望，而不通官场中许多曲折微妙的道理，这就是诗人、文人的特性。

陆游没有立即上任，先回山阴。范成大、韩无咎、周必大等送他离临安。范成大是名诗人，与陆游同在圣政所从事。他们都深为陆游抱不平。

这年五月，张浚督师北伐，初期打了一些小胜仗，收复了几座城池，但由于准备不够，两路主帅李显忠与郡宏渊不和，影响到其他将帅的斗志，所以在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与金军主力一触即溃。赵昚信心顿失。主和派借机攻击主战派，张浚降职为江淮宣抚使。七月，赵昚起用汤思退与金谋和。金

要求割让海、泗、邓、唐，赵昀不予，十二月又起用张浚为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仍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准备再度用兵。隆兴二年（1164年）三月，张浚督师过京口，与陆游会面。陆游支持张浚继续用兵。张浚也勉励陆游学习军事，多和镇江的老将来往。陆游以“素不知兵，又多病，未尝识诸将”为由婉拒。张浚想邀陆游到军中工作，陆游答说：“方以愚戆，不敢安于朝，岂敢复累公。”张浚表示还朝后要力荐陆游入军中。张浚的幕府中人如陈俊卿、张栻、张孝祥、王质等这一段与陆游过从甚密。陆游有诗追忆与他们的交游：“往者江淮未彻兵，丹阳邂逅识耆英。叩门偶辍诸公后，倒屣曾蒙一笑迎。”陆游和他们一起筹划大计，“当年买酒醉新丰，豪士相期意气中。插羽军书立谈办，如山铁骑一麾空。”陆游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但就在张浚积极准备战事时，汤思退指使龙大渊、王之望奏“兵少粮乏，楼橹器械未备；人言委四万众守泗州非计”，尹穉又弹劾张浚“跋扈”，因而四月张浚被罢，赵昀决意弃地求和。八月，张浚病逝。陆游作诗痛悼：“张公遂如此，海内共悲辛；遗虜犹遗种，皇天夺老臣！”

张浚罢后，汤思退全撤两淮边备，并密令孙造勾结金朝谕以重兵胁和。十一月，楚州、濠州（今安徽凤阳）、滁州（今安徽滁县）尽都失陷。太学士张观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论汤思退等人误国之罪，请斩汤并逐其同党，而用陈康伯、胡铨、虞允文。陆游对上书事极为欣赏，后有诗相赞：“往岁淮边虜未归，诸生合疏论危机。人材衰靡方当虑，士气峥嵘未可非。”

在舆论压力下，汤思退罢相，以陈康伯为宰相兼枢密使。但和议形势已成定局。这时，陆游上书二府请求移都建康，意在为今后恢复大计打下基础。但显而易见，陆游的进言是不合时宜的，犹如石沉大海。十二月，南宋与金订立“隆兴和议”，北伐以无功而终。

陆游在镇江做通判，通判是知州事的副职，没有什么实权。张浚的幕府中人都星散了，陆游整天无事可做，非常无聊。其《逍遥》诗说：“台省诸公日造朝，放慵别驾愧逍遥。州如斗大真无事，日抵年长未易消。午坐焚香常寂寂，晨兴署字亦寥寥。时平更喜戈船静，闲看城边带雨潮。”“州如斗大”流露出诗人对职位的不满，“日抵年长”极写无所事事的日子的难熬，两句夸张，更兼“寂寂”、“寥寥”的形容，让人感到诗人的心压抑得要爆炸。但诗人笔锋一带，以“时平”转一己之落寞情绪，而“更喜戈船静”，只要不再起烽烟，自己不得其用也罢，可以“闲看城边带雨潮”。这一转折，既是身事上的无奈，又说明陆游还是通达的，不全以一己为念。

官闲无事，陆游把高祖陆轸的《修心鑑》刻出来，并写了一篇跋：“右高祖太傅公《修心鑑》一篇。初，公生七年，家贫未就学，忽自作诗，有神仙语，观者惊焉。晚自号朝隐子，尝退朝，见异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许。邀与俱归，则古仙人嵩山栖真施先生真吾也。因受炼丹辟谷之术，尸解而去。然其术秘不传，今惟此书尚存。某既刻版传世，并以七岁吟及自赞附卷末，庶几笃志方外之士读之，有所发焉，亦公之遗意也。隆兴二年七月二日，元孙某谨书。”慕道修仙是文人士大夫的一种习气，也是他们在功名事业之外的一种寄

托。陆游闲生逸志，浮思联翩，从高祖那里找到修仙可成的实例，其实践中包含许多有意无意的幻想成分，但不妨将它当一篇微型笔记小说来欣赏。

这年闰十一月，已调江西的名诗人韩无咎来镇江，与陆游盘桓两个多月，游玩唱和。陆游后在《京口唱和序》中记载了他们的这段交谊情形，并发表感慨说：“予老，益厌事，思自放于山巅水涯，与世相忘，而无咎又方用于朝，其势未能遽合，则今日之乐，岂不甚可贵哉。”陆游此时才四十一岁，功业无成，便黯然有衰老之感，以至想要退隐，“与世相忘”。但这只是自叹为世所弃，他怎么能忘世呢？陆游的心情，由《浣溪沙·和无咎韵》一词可见：“懒向沙头醉玉瓶，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忙日若多闲日少，新愁常续旧愁生，客中无伴怕君行。”陆游虽然有时也忙，但只是一些杂务，所以愁情迭生，也就更怕寂寞，留恋知交之欢。

“隆兴和议”签订后，孝宗改元“乾道”。“隆兴”有进取意，“乾道”标志太平统治，年号的改变体现了政策的改变。隆兴元年（1165年）二月，宰相陈康伯去世，主和派更加得势，汤思退余党洪适主事，他昔日曾诬告“张浚妄费”，致使张浚罢相，现在更是大力排挤张浚一派的官员。张浚的幕僚陈俊卿、王质、张孝祥、王十朋、李石等纷纷遭贬或落职。陆游也改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远离京师，又如韩无咎所说，须“冒六月之暑，抗风涛之险”，无异放逐，怪不得韩无咎为他抱不平了。陆游乘船沿江而上，一路疲劳，又遇风涛，“舟败几溺”。到南昌后，陆游的思想非常苦闷，常去

当地的道观谈道，有时也看看“坐忘论”、“高象先金丹歌”一类道经。但他的厄运尚未到头。这年十二月，洪适掌握了二府大权，加紧打击张浚旧人。乾道二年正月，言官弹劾陆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陆游因而被免职。

官既已罢，陆游只有准备还乡。行前特意去临川拜访友人李德远，途中作诗《上巳临川道中》一首：“二月六日春水生，陆子初有临川行。溪深桥断不得渡，城近卧闻吹角声。三月三日天气新，临川道中愁杀人。纤纤女手桑叶绿，漠漠客舍桐花春。平生怕路如怕虎，幽居不省游城府。鹤躯苦瘦坐长饥，龟息无声惟默数。如今自怜还自笑，敛版低心事年少。儒冠未恨终自误，刀笔最惊非素料。五更欹枕一凄然，梦里扁舟水接天。红蕖绿菱梅山下，白塔朱楼禹庙边。”自责自贬，自怜自笑，没有怨言，只有愁情，一路春光都入眼不入心，只是慕道思隐。但其《寄别李德远又一首》中，就有些怨世情绪了：“李侯不恨世卖友，陆子那须钱买山。出牧君当千里去，归耕我判一生闲。中原乱后儒风替，党禁兴来士气孱。复古主盟须老手，勉追庆历数公间。”还乡途中，端午节在临安与尹穉同观赛龙舟。尹穉是陆游在枢密院时的同事、主和派，因劾张浚等主战派而连连升官。陆游与尹穉分手前作诗一首：“楚人遗俗阅千年，箫鼓喧呼斗画船。风浪如山蛟鳄横，何心此地更争先。”陆游触赛舟之景动落泊之情，借龙舟争先之事明自己无心争先之志，末句颇有一语双关之妙。

陆游曾用京口所得薪俸，在镜湖三山筑宅一所，回山阴后，他就移家镜湖三山的新居，开始过“欣然击壤咏陶唐”、

“墓前自誓”、“泽畔行吟”、“雨润北窗看洗竹，霜清南陌课剥桑”的山水田园生活。只是，落职归乡，空空行囊，以诗人之志，他必定不会有多少欢欣。

心未太平蜀道难

陆游在镜湖三山的新居，环境甚为优美而幽静：“吾庐烟树间，正占湖一曲。远山何所似？鬢髻绿。近山更可人，连娟两眉蹙。”经过不断整治、装点，更是世外桃源：“涧蟠偃盖松，路暗围尺竹。海棠虽妍华，态度终不俗。最奇女郎花，宛有世外躅。”

多年宦游，初归田园，陆游的心情还是比较闲适安恬的。他用诗笔记下农家生活的种种情形和点点滴滴感受，乡土气息浓郁。流传甚广的名篇《游山西村》就作于这时：“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首七律，首联先抑后扬，以“浑”托“足”，突出农家的热情好客，虽然条件有限，但是尽其所能。淳朴乡风，丰年喜气，跃然纸上。第二联以诗人出游的路线、寻访的过程来状写山西村世外桃源般的地理位置，“山重水复”正是江南丘陵的自然特色，“柳暗花明”也是山国之春的独有风光，江南山水之趣，就在这山重水复的一疑和柳暗花明的一喜之间。以疑衬喜，诗人的游兴尽出。趣中寓理，山重水复不要犹疑，寻寻觅觅，很快就会发现前方别有洞天，理

复成趣。柳暗花明既与山重水复对，又有重与复相承、明与暗相对，状难写之景，而成句如此之工，闲情雅志在奇幻多姿的自然景致触发上，产生了这样千古传唱余韵不减的名句。第三联接着直写农村的人情风俗和欢愉气氛，箫鼓追随，衣冠简朴，其声透过诗行从几百年前传来，诱人前往山阴叩听；其风至今仍在山间承传，有待读者自往南乡访寻。诗人少读《陶渊明集》以至忘食，直至今天归返山园，才真得陶的心情，陶的意境。这就难怪诗人留连忘返，“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立愿将要重来、常来了。

诗人笔下的田园生活，常常打上宦游心情的烙印。如《观村童戏溪上》一首：“雨余溪水掠堤平，闲看村童戏晚晴。竹马踉蹌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三冬暂就儒生学，千耦还从父老耕。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诗人当年也像这些村童一般因慕公卿而苦读，但经数载宦海沉浮，已经厌倦，所以对村童冲浪、放风筝的生活充满羡慕，对寒窗苦读不以为然。这当然不是劝告村童甘于耕种生活，而只是借此抒发自己官场失意的心情，在人生空幻的感慨中怀恋起人之初的那份童真。

有时诗人从道经中去寻求寄托。《夜读隐书有感》写道：“平生志慕白云乡，俯仰人间每自伤。倦鹤摧颓宁望斜，寒龟蹙缩且支床。力探鸿宝寻奇诀，剩采青精试秘方。常鄙臞仙老山泽，要令仰首看飞翔。”仙乡并非是诗人平生所慕，只是在官场失意之时，深为俯仰人间、低声下气、小心翼翼、不能自主而觉得屈辱、伤感。现在贬官回家，更是想“乘空飞去”，摆脱尘世烦恼。当初苏轼是“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

寒”，耐不得隐居生活的孤寂的，这是文人的共同心态，想离尘遁世又不能放弃人间的欢乐与希望，畏惧“仙乡”的那份凄凉。所以只能在诗中宣泄一下情绪，并不致身体力行。何况陆游还要为一大家子操劳许多俗事呢。《统分稻晚归》写的就是俗而真实的生活：“出裹一簞饭，归收百把禾。勤劳解堪忍，余暇更吟哦。岁恶增吾困，家贫赖吾多。村醪莫辞醉，羹芋学岷峨。”要是儿子收不上租谷，他喝不上酒，吃不上芋羹，就没心思吟哦什么“倦鹤”、“寒龟”和“奇诀”了。

有儿子操劳家务，有田可以出租，诗人就有闲心去看《黄庭经》。“闲暇无事心太平”这句道经颇为引起他的共鸣。他作《独学》一诗说：“师友雕零身白首，杜门独学就谁评？秋风弃扇知安命，小炷留灯悟养生。踵息无声酣午枕，舌根忘味美晨烹。少年妄起功名念，岂信身闲心太平。”少年时雄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饱经沧桑之后，为世所弃，才安于命运，清心养性。灯蕊燃得慢，灯就亮得长，人不要有太多妄念，不要太忙碌奔波，就能多活几年。想到这些，他就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坦然了。《长相思》一词，他自觉已经到达“心太平”的境界：“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爱松声，爱泉声，写向孤桐谁解听，空江秋月明。”《破阵子》词继续强化这种看破红尘的心境：“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蜡屐登山真率饮，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闲心太平。料峭余寒犹力，廉纤细雨初晴，苔纸闲题谿上句，菱唱遥闻烟外声，与君同醉醒。”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可斋”，作诗《书室名可斋或问其义作此告之》：“得福常廉祸自轻，坦然无愧亦无惊。平生秘诀今相付，只向君心可处行。”

对于人生与命运，不同人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人生阶段有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既受社会观念影响，又根本取决于个人的心态，最后要经过个人的许可、认同。陆游自己认可了一种生活态度，因而得以安然于命运。但是这种认定也会变化，这种安然也只是一时。正当壮年的诗人，还是忘不了昔日的幻梦，时时有抑不住的失落、感伤。《闻雨》一诗表白了他的另一番心境：“慷慨心犹壮，蹉跎鬓已秋。百年殊鼎鼎，万事只悠悠。不悟鱼千里，终归貉一丘。夜阑闻急雨，起坐涕交流。”《休日有感》一诗，对昔日宦游生活的浪漫多姿无限怀恋，对乡村生活的寂寞冷清惆怅不已：“少年从宦地，休日喜无涯。坐上强留客，街头旋买花。开轩催讯扫，脱帽共喧哗。村巷朋游绝，逢春只自嗟。”诗人悲身怨世的情绪在笔下时有流露，如《残春》：“残春醉着钓鱼庵，花雨娱人落半岩。岂是天公无皂白，独悲世俗异酸咸。妄身似梦行当觉，谈口如狂未易缄。已作沉舟君勿叹，年来何止阅千帆。”诗人责怪自己“谈口如狂”，多嘴乱说，但心中还是暗怨天公黑白不分、世俗不容真人真性的。末联取意唐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许多人功成名就、飞黄腾达，自己却潦落山乡、无所作为，说是不要嗟叹，其实是掩抑了无数声叹息。

在这种时而平静时而不安、时而欢欣时而悲慨的心情替变中，诗人熬过了一年又一年。他关注着时事，等待着机会。且不说功业，他一大家子，要维持生活现状，久无俸禄，也难以继。这期间他曾上书二府请求宫祠，也就是凭自己曾经为官的资历，要一个空衔以领取一份俸禄。他在《上二府

乞宫祠启》中说：“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黄冠而归故乡，辄冀奉祠之乐。恃廓庙并容之度，忘江湖远屏之踪。敬布忱诚，仰干造化。伏念某读书有限，与世无缘，岁月供簿领之劳，衣食夺山林之志。抚心自悼，顾影知惭，倘少遁于饥寒，誓永投于闲散。顷以牵联而少进，惕然恐惧而弗宁，亟辞振鹭之廷，径返屠羊之肆。优游食足，敢陈楚些之穷；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苦。伏望某官因材施教，与物为春。察其愚无能，乏细木侏儒之用；哀其穷不自活，捐太仓红腐之余。特暇闲官，使安晚节。弃羹糗如孤雏死鼠，宁是矜怜；譬杜牧以白骨游魂，少加恤养。某谨当收身末路，没齿穷山，玩仙圣之微言，乐唐虞之盛化。杜门扫轨，固莫望于功名；却粒茹芝，冀粗成于道术。虽无以报，犹不辱如。”这篇近乎乞讨的文章，似乎有损陆游伟大诗人的形象。不过当时的陆游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也没有什么高尚的人格需要小心维护，他只是一个普通书生、遭贬的小官，有生活的需要，有争取一份“养老金”的权力。古代文人出仕首先是为谋生，然后才谈得上大济天下。知识的价值也就在于取得为官的资格，否则在当时一钱不值。诗人如果穷困潦倒，即使诗名再高，也只是人们垂怜的对象，时人对他的敬慕与爱惜，不会比对他的轻蔑和冷嘲热讽多多少。世人更羡慕和尊重那些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而对徒有诗才的一介寒士是不屑一顾的，即是偶有惜慕，也是廉价的。这就是现实的无情，是知识的悲哀，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深刻悲剧。如果陆游这时仍然一心念着天下兴亡，浑忘个人饥饱温寒，那固然可敬，也未免有些可笑和可怪。所以这篇乞禄文，倒是实实在在，据理力争，其

情可怜，其心意可以理解。他仕宦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朝廷将他贬回本就不公，连奉祠的权力也不给更是于情理不合。陆游敢于主动提出要求，不顾什么虚面子、假节气，其勇气、其真性情才是诗人的本来面目。今人为尊者讳，不愿正视这一点，努力塑造他的理想化形象，其实是抹煞了诗人的风采。

当时二府为排斥陆游的人把持，当然不会答应他这点小小的要求。诗人生计成了问题，也就更不能独学《黄庭经》、身闲心太平，不能甘于收身末路、没齿穷山了。一旦有可能，他就要重新出山，凭他用世的热情、良愿和自己的一份特长，去争取一份不厌其丰的俸禄。

时间在流逝，朝政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隆兴和议”之后，金朝对南宋的威胁并未解除。金主完颜雍内修政治，对外保持军事优势，随时有入侵的可能，这是赵昚也能看到的。乾道三年（1167年）二月，谏议陈天麟启奏说：“近探报敌聚粮增戍，以其太子为元帅居汴。宜择将帅，预讲御备之策。”赵昚深以为然。于是逐佞幸龙大渊、曾觐，以示求治决心，并大力提拔张浚旧部陈俊卿。乾道四年十月，陈俊卿升右相，五年八月，又升左相，虞允文为右相。陈“以用人为己任”，虞也以“人材为急”，他们“多荐知名士”，南京政府又呈现新的气象。陆游昔日与陈俊卿在京口交好，又与他同属张浚一派而被罢，现在看到了希望，赶紧给陈去贺信，表达了为官报国的愿望：“某孤远一介，违离累年。登李膺之舟，恍如昨梦；游公孙之阁，尚凯兹时。敢誓糜捐，以待驱策。”李膺是汉末名士，“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陆游拿李膺比

陈俊卿，说他与陈昔日在京口的交游是“登李膺之舟”，表达的是被其容接的愿望。公孙指汉武帝时宰相公孙弘，他“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以公孙比陈，同样是表达被延纳的心意。末句发誓如被起用，任凭驱策，粉骨碎身在所不辞。

这封信发生了效力，陆游又被起用了，但不是“游公孙之阁”，而是远奔夔州（今四川奉节），仍任通判。这与他当初直接触怒了皇上不无关系。赵昀不会愿意一个政治上幼稚、喜欢多嘴多舌的名诗人留在朝中。陆游的失望可想而知，然而他又哪敢流露？在《通判夔州谢政府启》中，他说：“贫不自支，食粥已逾数日；幸非望及，弹冠忽佐以名州。孰知罪戾之余，犹在怜悯之数。”他经过遭贬，牵连被罢，如今能得一官已经不易，哪敢挑三拣四？食粥数日可能是夸张，但若久不为官，对于别无谋生本领的一介书生来说，形同失业，最后恐怕连粥也不一定喝得上。陶渊明、杜甫，乃至官至中书舍人的苏轼，不都挨过饿么？所以他只能抱惭感恩，无心也不敢再提什么功业了：“伏念某少也畸人，长而独学。好庄周《齐物》之说，乐以忘忧；读嵇康养生忙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寝深，儿女忽其满前，藜藿至于并日。屡求吏隐，冀代躬耕。亦尝辱说其姓名，因欲稍畀之衣食。”养家糊口，成为出仕的第一目的，想要独学、独游、隐居躬耕也不能够。当然，诗人心中未必绝了功名之念，只是潦落到这般境地，早已锐气磨光，口吐狂言不过徒自取笑而已。那么他还能抱持什么衣食之外的、算得上“高雅”或“高尚”的目的去赴任呢？“今将穷江湖万里之险，历吴楚旧都之雄。山巅水涯，极

诡异之观；废宫故墟，吊兴废之迹”，这也算得上乐趣吧。“动心忍性，庶几进于豪分；娱忧纾悲，亦当勉见于言语。”吟诗作文，以冀“粗传于后世”，这也不失为一种事业，不失为一种寄托和希望。

远赴夔州，这确实是陆游的宦运多乖。但是，创作需要生活积累，尤其需要不断变化的生活，需要新的环境刺激新的情绪。从这点说，正是入蜀，将陆游的创作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使他走向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星斗位置。

陆游是在乾道五年十二月被召用夔州通判的，由于久病，他直到第二年闰五月才起程。李白早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山阴离夔州路途遥远，又只能走水路，随时有风涛之险，陆游携全家大小十口，不能不视为畏途。夔府不仅遥远，又是个荒僻的地方，在那里难以有所作为，看不到前途。所以陆游很不情愿前往，说这番为官是“幕府误辟召”。他希望能改派军职，或许仕途上会有转机，不像多年来在文职上徘徊不进。所以经过临安时，他投诗参知政事梁克家，吐露他心惮远役的苦衷和从戎立功的志愿：“浮生无根株，志士惜浪死，鸡鸣预何人？推枕夕中起。游也本无奇，腰折百僚底，流离鬢成丝，悲咤泪如洗。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远冲三伏热，前指九月水。回首长安城，未忍便万里，袖诗叩东府，再拜求望履。平生实易足，名幸污黄纸，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颇闻匈奴乱，天意殄蛇豕，何时嫖姚师，大雪渭桥耻？士各奋所长，儒生未宜鄙，复覩草军书，不畏寒堕指”。陆游当初投身抗金大潮，满怀热忱，现在落到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的地步，心中悲哀不言自明。他希望再

入军幕，既是寻求转机，也是重温旧梦，在旧梦中发现希望。他最风光的日子是在抗金时，现在他期盼那些日子再来，为天下大计，也为个人成败。他因主战遭贬，所以还希冀因战事而再被重用，既洗尽自己的冤屈，也在国家的重兴中成就自己之生前声名，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正是他这番心迹的真实表白。“士各奋所长，儒生未宜鄙”，充分显示了一介书生不甘沉寂的进取精神。

但不管陆游情愿与否，他还是上路了，过镇口，沿长江西上入蜀，边行边游，一路大好河山，不断触发文人的雅兴。他是个有心人，用日记将途中的山川风俗、名人遗踪、寺观胜迹、典故传说以至轶闻趣事，及自己的感受、看法，都按日记了下来，而成《入蜀记》六卷。其文笔简洁清隽、平实自然，既有生活气息，又具知识性、趣味性，颇有可观之处。

诗人全家于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抵目的地，行程数千里，历时近半年，宦游之苦，不难想见。《入蜀记》平白记事，没有流露出多少怨望情绪，但从其中大量关于寺观僧道、隐者真人、迁官骚客的记载，可以窥见诗人的心曲。入蜀过程中陆游也作了许多诗。诗主情，陆游的满腹牢骚和怅恨一览无遗。经枫桥时，作《宿枫桥》诗：“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风月未须轻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半夜未眠，是畏惧千重山水。晚泊巴东，他吟道：“半世无归似转蓬，今朝作梦到巴东。身游万死一生地，路入千峰万嶂中。”不得归宿，恍若梦游，诗人心境在险途中黯淡已极。郁积至深，便出佳辞工句。如《黄州》：“局促常悲类楚囚，迁流还叹学齐优。江声不尽英雄恨，天地无私草木秋。万里羁愁添白发，一帆寒

日过黄州。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楚人钟仪囚于晋，陆游以此自比，视入蜀为作异国囚徒，颇有怨主之意。齐优指东方朔、淳于髡，善以滑稽谏主，自己忠言直谏却遭迁贬，只如齐优一般轻贱可笑。自比齐优，更加流露出对君主的不满。首联借人写己，颌联托物写意，时不待人，一秋又至，英雄胸中不平之意、遗恨之情，如江声不尽。自然风景、时令节气，巧妙地融入了诗人的情境。颈联抒情、叙事兼摹象写景，“万里”对“一帆”，是宦游情形，“寒日”是景，“羁愁”是情，又成巧对，“添白发”是摹象，极衬羁愁，“过黄州”是叙事，“黄”以地名中颜色词借对“白”，天衣无缝。其中“寒”字更是用得绝妙，太阳本是火热的，但诗人的心是寒的，秋天有寒意，阳光也不炽烈，所以在他的感觉上就是一轮寒日。心寒日亦寒，可见其心是何等之寒。正因心寒至此，所以陆游才反曹操“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意而悲观绝望地说，你看无数英雄曾在赤壁争雄，如今不都灰飞烟灭、成了陈迹吗？人生何必定如孙仲谋那般有作为呢？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人生失意、怀古伤今、无可奈何的哀叹，在此得到了深深共鸣。

《黄州》一诗，既有苏词豪放悲壮的气势，又有杜诗沉郁顿挫的情怀。“江声”大，“天地”广，“万里”遥，急转为“一帆”之孤，巨大的反差构成情绪的大起大落。此诗以空间之旷阔，显胸臆之郁结，以江声之持久喻心潮之难平，以意入景，由境出情，构成雄浑而悠远的意境，是陆游诗中的上乘之作，也是历代诗歌中的珍品。

尽管诗人有一肚子的牢骚与怅惘，畏途总算已经走过，他

到了任上，不唯有了俸禄，也有了事业，有了寄托，甚至可以说也有了一些新的盼头。诗人总是爱幻想的，总是不断产生现实的或虚幻的希望。带着这种幻想或梦想，诗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咏怀古人以抒情志是诗人们的惯用手法。陆游对那些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人，尤其是心怀君王却遭致不公正待遇的人特别留意，用他的诗笔表现了深挚的同情与敬意。如在秭归作《饮罢寺门独立有感》咏怀屈原和王昭君：“一邑无平土，邦人例得穷。凄凉远嫁妇，憔悴独醒翁。”较之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已有的“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陆游不敢和他斗才，只是简单一句“凄凉远嫁妇，”已足表露诗人心中的凄凉之感。而“憔悴独醒翁，”则分明是作者自己的写照了。

从夔州到南郑

陆游在夔州的职责是主管学事兼管劝农事。陆游到夔州的第二年，正遇上贡举之年。这年四月，夔府举行州试进士，陆游按规定担任监考官，只负责监考，不得过问考试事。科举事是万人同挤独木桥，纠纷最多，陆游当年就遇到过麻烦，所以他不愿介入，称疾辞任，未获批准。他与别的试官不熟，担心违反规定，招惹是非，自始至终不敢多话。有时看见一些好文章被涂抹疵诋，心中生气，也只能回到卧室独自叹气。有个叫王樵的秀才，其试卷陆游认为是“可敬”和“可敬可畏”的，但不知为什么被黜落。王樵向陆游去信提出质疑，陆游写《答王樵秀才书》，说明自己为难和无能为力的苦衷：“盖再三熟计，虽复强聒，彼护短者决不可回，但取诟耳，若可回，虽诟固不避也。”向王樵表示深深的同情：“然士以功名自许，非得一官，则功名不可致。虽决当黜，尚悒悒不能已，况以疑黜乎？某往在朝，见达官贵人免去，不忧沮者盖寡。彼已贵，虽免，贵固在，其所失孰与足下多，然犹如此。今乃责足下不少动心，亦非人情矣。前辈有钱希白，少时试开封，得第二。希白豪迈，自谓当第一，乃诣阙上书诋主司。当时不以为大过，希白卒为名臣。夫科举得失为重，希白不

能忍其细，而责足下默于其重者，可不可耶？”陆游虽然对王樵的不平表示理解，没说劝慰的话，但不厌其烦地举出科举、官场上得失、沉浮的例子，本身已足让王樵明白世上不公平事甚多，不必挂怀。他能对一名秀才如此推心置腹，可见陆游的平易、善良。

杜甫曾经在夔府住了两年多，在好几个地方住过。陆游在公余之暇访问了杜甫当年流寓的东屯高斋的遗地，作《东屯高斋记》：“少陵先生晚游夔州，爱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斋。质于其居，日次水门者，白帝城之高斋也；日依药饵者，瀼西之高斋也；日见一川者，东屯之高斋也。故其诗又曰：‘高斋非一处。’予至夔数月，吊先生之遗迹，则白帝城已废为丘墟百有余年，自城郭府寺，父老无知其处者，况所谓高斋乎；瀼西，盖今夔府治所，画为阡陌，裂为坊市，高斋犹不可识。独东屯有李氏者，居已数世，上距少陵，才三易主，大历中故券犹在。而高斋负山带溪，气象良是。李氏业进氏，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属予记之。”陆游这么不辞劳苦地奔走寻访杜甫的遗址，当然不是为了考证什么，而是出于对杜甫的仰慕、怜惜与缅怀之情，同时也是因为自己的遭际与杜甫“坎壈且死”的一生颇有相似之处，二人都有伟大的抱负，想用所学为君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成一世功名，却得不到机会。他悲怀杜甫，也是自伤。陆游带着自叹写道：“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肃宗，官爵虽不尊显，而见知实深。盖尝慨然以稷、契自许。及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覆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然去国寢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比至

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中，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余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方殊’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乎！辞之悲，乃至是乎？荆轲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光贞观开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壈且死，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陆游与杜甫一样只是人微言轻的小臣，贬到偏远的蜀地，更无进策的机会，老病失意而流落异乡，难怪陆游要流涕了。愈老愈穷愈病而愈不得志愈看不到希望，所以杜甫才有至悲之句，陆游才为他也为自己发出了至悲之叹，流下了至悲之泪。陆游还作有《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诗，怀人伤己：“拾遗白发有谁怜？零落歌诗遍两川。人立飞楼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然。”杜甫诗有“孤月浪中翻”之句，人已去，景犹存，文人的落泊命运，还在一代接一代延续。

杜甫在蜀时吟颂诸葛亮的诗章甚多，陆游也对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相深为景仰和怀念。在夔府东南有诸葛亮的八陈图遗迹。陆游凭吊这些遗迹，吟道：“武侯八阵孙吴法，工部十诗韶隲音。遗碣故祠春草合，略无人解两公心。”陆游是知道杜甫的心的，杜甫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愿，可是他得不到机会，不能成就诸葛亮三分天下的功业。而“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悲绝千古、壮绝千古的名句，正是杜甫在功未立就“繁霜鬓”的苦恨中吟出的。陆游何尝不担心自己壮心未遂身先衰呢？他有英雄志英雄恨，才和杜甫一样为壮志未酬的英雄热泪满襟。

不满也罢，无聊无奈也罢，都只是一种情绪，失落的只

是昔日的少年梦幻，并未真的失去，因为从来就没有得到。但是，如果夔州通判三年任期已满而未有新的召用，那就是失业了，这个现实问题比什么都要迫切。乾道八年陆游任期将满，他向现任丞相虞允文去信谋求一官。求官对于一位心高气傲的诗人来说实在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但陆游不是乞求不是强求而是振振有辞地说出一番道理来：“某闻才而见任，功而见录，天下以为当。君子曰：‘是管仲相齐、卫鞅相秦之法耳’。有人于此，才不足任，功不足录，直以穷故哀之，天下且以为过。君子则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赖其才，因有高位处之；彼有功，吾借其功，因以厚禄报之。上持禄与位以御其下，下挟才与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齐秦用之，虽足济一时之急，而俗以大坏，君子羞称也。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则不然。无才也，无功也，是直无所用也。无所用之人，虽穷而死者百千辈，何损于人之国哉？自薄者视之尚奚恤。君子故深哀之，视其穷，若自我推以与之不敢安也，矜怜抚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适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无所用而穷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于天下无所用之人，非圣贤孰能哉？谓之三代之政，则宜。故王霸之分，常在于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陆游不敢说自己有功有才，只以穷为由来求官，并极力论说这是理所固然。一者，他把因才受位、因功受禄说成“市道”，也就是交换，没有人情味，没有仁爱 and 忠信之心。二者，他把垂怜穷人说成是圣人之政，是王者之道。一否定一拔高，他这无才无功的穷人就不仅应该受照顾，照顾了他还是成全了朝廷的圣声美名。这就是文人

的好笑之处，事事都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找一种说明，而后心中才坦然，哪怕那理由只是在逻辑上成立也坦然。陆游有了诉穷求官的理由，接下来就大夸其穷，将一家十口说成“食指以百数”，将二十四的长子说成“儿年三十”，十二岁的女儿说成“女二十”，“婚嫁尚不敢言”，“大丞相所宜哀也”，是应该哀怜，而非乞求哀怜。不给官就是不合王道圣政，给官就是圣贤、父母之心，陆游等于是在咄咄逼人地究问：“给官还是不给？怜我还是不怜？”他本就有才也不无功，有求官的资格，如今又说得这么哀婉这么入情入理，当然就给他官了。乾道七年七月，四川宣抚使王炎辟陆游为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四十八岁的陆游从夔州调往南郑。

王炎是一个干练、有魄力的官员，很得皇上信任，时以参知政事宣抚川陕，掌握着西北军政财权。陆游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希望，积极献策，认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这是英雄共识，以关中为基地图谋恢复。如陆游诗所说：“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陆游甚至主张迁都关中：“鸡犬相闻三万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山河夕照红。”这种主张也早已有人提出过，也许是为上策，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朝廷已为一种不可克服的惰性所浸渗，兴师动众、劳民生财也是多数人以为然的，毕竟恢复中原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这未沦陷的一半也要有正常的生活、太平的日子。所以那些处于浪尖上的高级官员都是不敢轻言战事的，西师主帅吴玠死前就曾上遗表嘱赵昚“宋轻出兵”。以南宋之羸弱根本不可

能恢复中原，这只是一种愿望却不能立刻成为现实。只有那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策士才只考虑心愿不考虑观实，只有那些善于幻想容易激动的文人才以为一计可安天下，一策可复中原，在美好想象的支配下信口开河。可贵的是热情，以及热情酿造的诗句：“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大散陈仓间，山川都盘纡。劲气钟义士，可与共壮图。坡陀咸阳城，秦汉之故都。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安得从王师，讯扫迎皇舆。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上寿太安宫，复如正观初。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这首《观大散关图有感》，从诗人的心愿出发，描绘出金兵投降的胜利场面，自然让人快意，但快意之后就是茫然了。陆游不断申陈壮志、抒展豪情、设想胜利场面，仅仅能填补一下心中的缺憾，赢取刹那的快感，而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陆游的献策，是从心愿出发的，以想象掩盖现实，因此没多少参考作用。它们不合实际情况，但还是合于为政之道、用兵之法的，陆游的用心也是良好的，所以不被采纳，陆游心中就不痛快。后来他有诗说：“中岁远游踰剑阁，青衫误入征西幕。南阻水边秋射虎，大散关头夜闻角。画策虽工不见用，悲咤那复从军乐。”自认画策其工，不知是纸上谈兵，到老还有遗憾不平。

陆游的画策虽不为王炎所用，但王炎还是挺看重这位大诗人的。“宾主相期意气中”，说明他们之间关系比较融洽。

陆游到南郑的这年秋天，王炎照例防秋，即防止金兵在秋高马肥时入寇。陆游参加了这次防秋，为他的诗留下了真

切的戎马气息。“朝看十万阅武罢，暮辞三百巡边行。”“独骑洮河马，涉渭夜衔枚。”都是这段生活的记载。戎马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和胸襟，给他提供了更丰富的创作素材。多年以后他对这段生活一直念念不忘，吟出许多有劲声锐气的诗篇。如《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怀想巡边时的艰苦、惊险：“我昔从戎清渭侧，散关峨下临贼，铁衣上马就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书生从戎，报国的心愿付诸于行动，无怪诗人引以为自豪而有无穷回味了。“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这分明是将军胸臆，哪里还有书生面目！《书愤》中“中原北望色如山”、“铁马秋风大散关”等句，更是气冲斗牛。如果不是曾经身临其境，哪里能体会得到“铁马”、“秋风”与雄关各自所呈现出的恢宏气势，而将三者组合到一起构成高远的意境！

陆游随军巡边，踏遍边防要塞，除了大散关，他还到过五丈原：“旧时胡尘陷关中，五丈原头作边面。”到过凤县的鬼迷店：“往者秦蜀间，慷慨事征戍，猿啼鬼迷店，马噤飞石铺。”到过甘肃两当：“乱山古驿经三折，小市孤城客两当。”到过陇右：“马啼并陇雷声急，士甲照甲波光明。”“忆昔从戎出渭滨，壶浆马首泣遗民。夜棲高冢占星象，画上巢车望虏尘。”到过驿谷：“我昔在南郑，夜过东骆谷，平川月如霜，万马皆露宿。”“散关驿近柳迎马，骆谷雪深风裂面。”

陆游把这种种经历都反映到诗中，使他的作品具有了边塞诗人诗歌的那种凄厉、劲猛、苍凉、壮越与高亢。随着生活的丰富、题材的扩大，他的心气和诗气都充沛起来，变得老练了，成熟了。

在军队驻防闲暇的时候，陆游常常射猎。“投笔书生古未有，从军乐事世间无。秋风逐虎花叱拨，夜雪射熊金仆姑。”文人所短在武事，没有能力驰骋疆场，在射猎中一试身手也其乐无穷。“猎骑荷戈归，争献虎与狼，是时意之快，岂复思江乡？”最让他快意的是一次遇虎：“眈眈此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仇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噉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诗人是否射杀了老虎，未见有记载，但这件惊险的事证明了他的勇气，使他能够相信自己有杀敌的本领，而不只是一介文弱甚至怯懦的书生。“南郑从戎嗟尚壮，中梁纵猎最难忘”。苏轼射猎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豪迈词章，陆游射猎也为自己增添了许多可歌可咏的欢愉记忆。

军营的生活是枯燥的，但闲暇时也有一些独特的娱乐活动，给陆游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军昔戍南山边，传烽直照东骆谷。军中罢战壮士闲，细草平郊恣驰逐。洮州骏马金络头，梁州毯场日打毯；玉杯传酒和鹿血，女真降虏弹箜篌；大呼拔帜思野战，杀气当年赤浮面。”宴饮自然是经常的事，不仅有音乐、美酒，还有美人陪同。这些美人，也就是官妓，她们佐酒的场面，在陆游笔下反映出来：“浴罢华清第二汤，红锦扑粉玉肌凉，娉婷初试藕丝裳。凤尺裁成猩红色，螭奩熏透麝脐香，水亭幽处捧霞觞。”陆游在这里找到了暂时的寄托与欢乐，常常“暮醉笙歌锦幄中”。

陆游的一些词中，也反映了南郑从戎的生活与心情。如《谢池春》：“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烽夜举。

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南郑的烽火，在记忆的暗夜中仍然燃着，前线的火热生活，让后来蛰居家乡、功名梦断的诗人无限怀恋。《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是诗人即景抒情的一首佳作。“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多情难似南山日，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角声、烽火，都是边城有代表性的景物，伴着慷慨的筑声，登高祝酒，这是多么豪迈的兴致！关东胜地，长安美景，等着人去欣赏，诗人对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心驰神往，收复失地的心愿与志向，也就借一个“待”字尽表而出。正是边城的壮丽景色，激发了诗人的豪兴，也正是边城的这份野旷与荒凉，才能任凭豪兴回旋飞翔。

前线生活是以放犷、空旷、苍凉、高茫、粗蛮、豪爽为特点的，与内地尤其是都城的轻曼、华丽、纤柔、平淡构成鲜明的对比，书生的性情总是带有内地特色的，到前线便能一洗那些伪饰、华而不实的习气，添一分野性，长无限豪情，诗人的诗词因此也就多了几分壮气，添了几分诡异秀丽的色彩。

陆游在前线紧张而充实地生活着，虽然无明确的前途，但还是能够怀持一些隐隐的幻想。他建功立业的念头，就寄托在恢复中原上了，只有恢复，才能让许多人得到一展宏图的机会。所以他哪怕是在雅兴勃勃的场合，也不忘进取之务。“参谋健笔落纵横，太尉清罇赏快晴。文雅风流虽可爱，关中遗虏要人平”。他不会满足于与人饮酒唱和，而希望轰轰烈烈

实干一场。王炎是一个实干并重武事的长官，宣抚幕中的同僚如张季长、刘戒之、范西叔、宇文叔介、高子长、周元吉、景德茂、阎才元等当时名士也都主战，与陆游意气相投。大家即是纸上谈兵，也能有一番痛快，风月之中淹留过多会生厌倦，幻想、言谈武事另是一种情趣。时论恢复，就能保留关于个人的也是国家的希望，才能活得既潇洒又不空虚，既疏放又不沦于平庸。

可是幻想总是要破灭的。乾道八年九月，王炎被召回临安，虞允文继任。幕僚皆散去，陆游改调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从此结束戎马生活。他在军幕中虽然未必能有什么作为，但既然他把个人前途寄望于恢复大计，把功业寄望于从戎，那么在军幕中他总能得到一些想象性的安慰。现在，他却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他只是一介书生，不善运筹不能征战，也没有运筹之所、征战之地。所以他倍感失落，尽管失落的只是幻想：“不如意事常千万，空想先锋宿渭桥。”“遗虏孱孱宁远略？孤臣耿耿独私忧。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他认为国家没有抓住收复机会，更是遗憾自己失去了机会。不论为国为己，他的耿耿私忧都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正因怀此私忧，他才不停奔走，上下求索，为个人也是国家的前程奋斗不息，并不断发出振己感人的歌吟。

官身奔走

乾道八年十一月二日，陆游离开南郑赴成都。成都号称“锦官城”，陆游《蜀相》诗中有“锦官城外柏森森”句。从艰苦的前线调到天府之国，陆游本应高兴，可他却感到失落和迷茫：“平生无远谋，一饱百念已。造物戏讥之，聊遣行万里。梁州在何处，飞蓬起孤垒。凭高望杜陵，烟树略可指。今朝忽梦破，跋马临漾水。此生均是客，处处皆可死。剑南亦何好？小憩聊尔尔。舟车有通途，吾行良未止。”在南郑，陆游还指望立功晋爵，王炎是个有才干、有作为的人，对他也较器重，可现在这个梦幻破灭了，陆游已快五十岁，官身奔走仅仅为了养活一家人，没有一点别的令人兴奋的盼头，而且还不得不继续奔走，不知何时到头，他怎不产生被命运捉弄的念头呢？

这时陆游萌发了归隐的念头。《思归引》说：“善泅不如稳乘舟，善骑不如谨乘辔。妙于服食，不如寡欲，工于揣摩，不如省事。在天有命谁得逃，在我无求直差易。散人家风脱纠缠，烟蓑雨笠全其天。莼丝老尽归不得，但坐长饥须俸钱。此身不堪阿堵役，宁待秋风始投檄。山林聊复取熊掌，仕宦真当弃鸡肋。锦城小憩不淹迟，即是轻舸下峡时。那用更为

麟阁梦，从今正有鹿门期。”文人士大夫最以为鄙的是为温饱这样的基本需求所役使，推崇精神方面的高尚追求，可陆游既不能成就功名，又不能抛弃那份俸钱，当官因而成了精神负担，成了食之无味、弃之不忍的鸡肋。诗人只有劝慰自己少欲省心，把归思作为宦游的心理后盾，没有进路有退路，多少可以冲缓宦游的厌倦情绪。

带着这种郁郁闷闷的心情，诗人骑着毛驴踟蹰在蜀道上。经剑门关时，遇上小雨，雨丝绵绵如愁绪不绝，诗人不禁吟道：“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失意远游，什么景致都只会触动愁怀，所以诗人“无处不消魂。”唐代诗人李白、杜甫、贾岛、郑棨等都有骑驴作诗的故事，骑驴似乎成了诗人的象征。陆游自问：这一辈子自己就只能做一个诗人吗？诗人几乎就是失意的代名词——迁客骚人，因为迁，才有牢骚、有诗意。他不甘心。试比较“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境，诗人却只是冒着微雨，骑着慢腾腾的驴子，在远离都城的地方逡巡，身上是纵酒之后的痕迹杂着征尘。字字句句，都浸透了失意、惆怅的情绪，当人们读出他心中的迷茫、伤感，也不禁为之消魂了。

成都府路安抚使晁公武是汤思退一派的，过去与王炎不和，对陆游颇为冷淡。陆游几乎无事可作，“身似野僧犹有发，门如村舍强名官”。他非常沮丧，吟道：“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醉来身外穷通小，老去人间毁誉轻。扞虱雄豪空自许，屠龙工巧竟何成。雅闻岷下多区芋，聊试寒炉玉糝羹。”“扞虱雄豪”指前燕隐士王猛，被褐见桓温，论说天下事，“扞虱而言，傍若无人”。陆游锋芒未试，不敢自诩雄

豪，别人也不会认可，只能说是“空自许”，但接又来又叹息屠龙工巧竟何成，学了屠龙之技而世间无龙可屠，分明是怨渭水岐山不出兵，自己空怀壮志，生不逢时，展才无地，只有以醉来忘怀穷通，身老心老自然不再看重毁誉，这正反映了他非常看重成败荣辱，也决不甘心寒炉煮芋羹的平凡生活。他是携着琴剑来到锦官城的，文人有琴心雅兴，更有剑胆豪情。这种心愿与现实的冲突，使他总是不得安宁。

他在成都也结交了一些朋友，“二十年前客锦城，酒徒诗友尽豪英。才名吏部倾朝野，意气成州共死生。”这当然是经过诗歌的夸饰、美化，就是一帮可以共饮消愁、唱和遣怀的文人，并没有太投合的意气和太深的交谊。

诗人心情不佳，又闲得无聊，就常常泡在酒肆和歌院中。他在《成都行》中写出了这种浪漫生活：“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青丝金络白雪驹，日斜驰遣迎名姝，燕脂褪尽见玉肤，绿鬟半脱娇不梳。吴绫便面对客书，斜行小草密复疏，墨君秀润瘦不枯，风枝雨叶笔笔殊。月浸罗袜清夜徂，满身花影醉索扶。东来此欢堕空虚，坐悲新霜点鬓须，易求合浦千斛珠，难觅锦江双鲤鱼。”文人狎妓与一般嫖客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出于精神上的压抑和苦闷而寻求心灵的渲泄与寄托。按儒士的观念，虽然不反对妻妾成群，却把狎妓视为放浪，而落魄文人纵迹青楼，就是有意违逆自己的观念，在这种自我放纵、自我折磨中赢得报复命运的快感。但他们心灵深处仍然是痛苦的。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更多的是慨叹与伤感。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是在科场不

得志的情况下的发泄，“奉旨填词”、专为青楼作歌更是对命运、对当朝的无声反抗。陆游心中有怨意，有不平，所以在酒楼歌院放纵行迹，这是对自我也是对时代与命运的一种逆反，要让自己麻醉、遗忘。然而这种麻醉与遗忘只是暂时的，借酒消愁愁更愁，娇音玉颜不解忧，离开了玉壶、名姝，他感到更加空虚。《成都行》用大段篇幅写名花、名酒、名姝给人带来的沉醉与欢快，是先扬至极点，再抑至极点，构成情绪的突转，将诗人内心的空虚、悲忧一下子暴露无遗。此诗是采用了古诗中惯用的以离忧写失意，以美人借代理想的手法。还有什么比离开美人或求而不得更让人伤感呢？那就是文人的理想文人的幻梦。《成都行》末四句似乎表明诗人的空虚是因为不见美人的尺素书，但实际上，是因为看不到希望，“坐悲新霜点鬓须”，诗人白发又添，怎么能不悲忧？

陆游在成都没呆多久，乾道九年（1173年）春，即调任蜀州（今四川重庆）通判。他在蜀州仍然很不得意，《初到蜀州寄成都诸友》一诗说道：“流落天涯鬓欲丝，年来用短始能奇。无材藉作长闲地，有懣留为剧饮资。万里不通京洛梦，一春最负牡丹时，壁笺极与诸公道，罨画亭边第一诗。”无材便长闲，本是因果关系，诗人却说正好借无材而长闲，是对自己的调侃，更隐含有材不得用的激愤；因懣而剧饮，诗人也把这种客观因承变为主观选择，用愤懣来助剧饮，表明诗人是清醒地、有意地借酒渲泄而非浑浑噩噩地在酒中忘世，那么很显然，酒只会助长这种愤懣而不会消融它。“无材”、“长闲”、“有懣”、“剧饮”这类字眼在古诗中是司空见惯的。诗人打破遣词造意的常规，使得它们具有了翻新出奇的表现力，

使得语气因之强烈了许多。“万里不通京洛梦，一春最负牡丹时”，更加直接地表现了诗人远离朝廷、不被重用、虚度光阴的苦恼和焦虑。牡丹是艳丽的、生机勃勃的，诗人却“流落天涯鬓欲丝”，在这鲜明的对比中，诗人有了最后之叹。

陆游在蜀州期间有时也去成都，他的行踪反映到他诗中。《自蜀州暂还成都奉简诸公》一诗表明他的心情仍是充满了沉郁与无奈：“不染元规一点尘，行歌偶到锦江滨。淋漓诗酒无虚日，判断莺花又过春。客路柳荫初堕岁，还家梅子欲生仁。更须着意勤相过，要信年光属散人。”诗人的诗渐渐显出了“老”气，这种“老”不是身衰体朽那样的老，而是意境的浑醇和技巧的成熟。少壮的锐气与字句的锋芒内化为心的沉着与诗的凝重，并且飘逸出几分空灵之韵。

这年五月，陆游又改调摄嘉州（今四川乐山）州事，家属留在蜀州。朝廷没有大动作，四川也风平浪静，生活缺少新鲜刺激，缺乏活力与激情，陆游的心情一如既往地若闷，他也一如既往地以诗酒度日。出游所作的诗中，看不到多少欢快气氛。如《凌云醉归作》：“峨眉月入平羌水，叹息吾行俄至此。谪仙一去五百年，至今醉魂呼不起。玻璃春满琉璃钟，宦情苦薄酒兴浓。饮如长鲸渴赴海，诗成放笔千觞空。十年看尽人间事，更觉麴生偏有味。君不见葡萄一斗换得西凉州，不如将军告身供一醉。”陆游早已被人称作“小太白”，这么多年来“看尽人间事”，才隐隐体会到“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真意不在纵酒也不在放笔，而在放纵、狂抒他的愁怀，宦情苦薄，诗人追慕谪仙的愈沉重愈超然的胸臆，他的诗中也飘出一股落于人间超物外的仙气来。“君不见葡萄美酒一斗换得

西凉州，不如将军告身供一醉”，对比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此不复还，”不光句式相仿，也有了李白还共长风去不归的潇洒姿态和奔泄气势。

《凌云醉归作》末二句的句式自由奔放，这在陆游的诗作中是不多见的。这可折射出他精神上的超脱。对世事愈来愈看得开，对世间、人生的所谓理想、信念、道义、规范等等也就愈不以为然，反映到作诗中无论形式、内容同样也少了许多束缚。他的诗越来越能自如地表现他的思想、情绪而文字上越来越少雕琢，却又自然而然地达到工巧。如《独游城西诸僧舍》：“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藓崖直上飞双屐，云洞前头岸幅巾。万里欲呼牛渚月，一生不受庾公尘。非无好客堪招唤，独往飘然觉更真。”律诗一般不重复用词，可“看山看水”这一重复却妙出天然，不可替换，如用“观山看山”或“赏山悦水”，韵味就少了许多。“飞双屐”不仅写爬山之快，更显出心情之畅。“飞”字看似信手拈来，其实是心欲飞自然感到身如飞，所以无心而又极有心地用了这个字。第三联“欲呼”与“不多”一气呵成，向往天空弃绝尘世，在“独往飘然”中进入到审美的自由境界，体会到了人生自我解脱的至真意境，与李白“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达到了精神的内在沟通。

蜀地的景观以危、奇、壮为特征，不似东南的秀、曲、雅。陆游的诗因之也多了几分奇诡的色彩。如《西林院》中“磴危渐觉山争出，屐响方惊阁半虚”一联，写出了蜀地景致的特征。“山争出”以动写静，回环险路和重重危山都活了起来，

在逼视人、压迫人，使人的心灵处于极度紧张之中，而后便得以极度扩张。“屐响”则极写山谷之幽深、空旷，非身临其境、亲闻其声不敢写出这样的句子，不能体会到仰视峭壁欲倾、俯临深谷欲坠的惊险。自然的奇伟使人生的悲喜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难怪诗人留连忘返，想要“弃官长住此”了。

陆游在嘉州做了一些实事。嘉州当青衣水入岷江的交会处，在夏天多雨的季节里，江水暴涨，常常危及城中居民的安全。城东二水交汇处的吕公堤，因年久失修，不足防水。陆游遂趁江水下退、冬季农闲的时机，发动农民来修堤。他在《十二月十一日视筑堤山》一诗中写下了当时筑堤时的情形。为了改善当地的交通，陆游还主持在岷江上架设了浮桥。《十月一日浮桥成以故事宴客凌云》一诗记载了此事：“阴风吹雨白昼昏，谁扫云雾开朝暾。三汪水缩献洲渚，九顶秀色欲塞门。西山下竹十万个，江面便可驰车辕。巷无居人亦何怪，释耒来看空山村。竹枝宛转秋猿苦，桑落湫澔春泉浑。众宾共醉忘烛跋，一径却下绿云根。走沙人语若潮卷，争桥烛火如星繁。肩舆睡兀到东郭，空有醉墨留衫痕。十年万事俱变灭，点检自觉惟身存。寒灯夜永照耿耿，卧赋长句招羁魂。”浮桥建成，居民纷涌而来观看，一时盛况空前，诗人心中是快乐的。可他毕竟是客居异乡，官身不定，大业无成，所以热闹之后，更觉空虚。

诗人仍然对武事充满兴趣。这年八月嘉州举行秋操阅武，他穿上戎衣，检阅军队，精神大振，意气风发地吟道：“陌上弓刀拥寓公，水边旌旆卷秋风。书生又试戎衣窄，山郡新添画角雄。早事枢庭虚画策，晚游幕府愧无功。草间鼠辈何劳

磔，要挽天河洗洛嵩。”在古代社会，最称得上丰功伟绩的莫过于开国安邦和平虏，武将的功勋和风采又是最激动人心的。文人尚武和慕侠一样都是寻求一种精神补偿，文武双全、琴剑风流是他们最理想的自我塑造。“书生又试戎衣窄”的心情，可想而知是多么欢畅、自豪，甚至可说是得意、自赏。陆游不满足于像草间鼠辈一样庸碌无为，可他早年为恢复大计而作的画策只是徒劳，后来游幕府更是无所建树，遗憾与焦虑在演武的壮观场面激发下，顿然化作了“要挽天河洗洛嵩”的壮歌。

这年正月，陆游的老友、试礼部尚书韩无咎出使金国，看见沦陷区人民日益被奴化，俨然已忘原是大宋子民，感慨万分，将所见所闻写下，连同一首小词《好事近》寄给陆游。词云：“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唯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陆游得书也忧叹不已，奋笔题诗：“大梁二月杏花开，锦衣公子乘传来。桐阴满第归不得，金辔玲珑上源驿。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书我寄来宴时诗，归鬓知添几缕丝？有志来须深感慨，筑城会据拂云祠。”陆游既痛心中原的长期沦陷和沦陷区人民的被奴化，更痛心自己无能为力。但他还是对收复失地抱有希望与信心的，他不会放弃希望，这是他为个人也为国家生活下去的动力。

陆游少时就好读岑参的诗，现在到了岑参当过本地刺史的嘉州，亲身领略了边塞的雄险飞动的气势与豪放悲凉的情调，更加理解和喜爱岑诗那种大开大合、奔放磅礴、寒热哀

怒总到极致的笔意。闲暇时，他刻出了《岑嘉州诗集》，并将岑参像刻于书斋壁上。“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常想从军时，气无玉关路。至今蠹简传，多昔横槊赋。”陆游在读自刻的《岑嘉州诗集》时，对岑参的诗，以及岑参的命运、心气，都产生了深深共鸣。

陆游在嘉州照例周围聚集着一帮诗友，其中有一个叫师伯浑的，是躬耕隐士，陆游‘一见知其为天下伟人’，为他的文集作序，序中说他“自少时名震奉蜀，东被吴楚，一时高流皆尊慕之，愿与交。方宣抚使临边，图复中原……闻伯浑名，将闻于朝，而卒为忌者所阻。”陆游感慨说：“为时惜，不为伯浑叹也”。这里边，包含了对自己不被重用的感叹和对时政的失望与愤懑。

作为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人，他的民族自尊感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国土不复、功名无就不仅让陆游感到焦虑，也让他感到屈辱。这种焦虑、屈辱和对朝政的失望、不满交替撕啮着他的心。在《金错刀行》中，他爆发出心中的怨气、闷气与豪气：“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浮靡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在另一首诗《长信宫词》中，他又以比较婉曲的骚体形式，托美人以言忠君之志和薄幸之怨：“忆年十七兮初入未央，获侍步辇兮恭承宠光。地寒祚薄兮自贻不祥，谗言乘之兮罪衅日彰。祸来嵯峨兮谁进薰香？婕妤才人兮俨其分行，千秋万岁兮永奉君王。妾虽益衰兮尚供蚕桑，愿置茧馆兮组织云

黄。欲诉不得兮仰呼苍苍，佩服忠贞兮之死敢忘！”可惜赵昀不知其一片耿耿忠心，即使知道也未必感动。但在陆游的幻想中，在他的心愿投射中，他的挚情、他的哀怨是能打动君王的，只是没有机会倾诉。然而即是这样，他仍怀抱忠贞至死不渝。这是对君王薄幸的一种更强烈的抗议。

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去世，陆游又调回蜀州，以通判摄理州事。调来调去陆游的职位没什么变化，官衔似乎高了，却又扣了个不伦不类的帽子——摄理，临时代理，随时可以摘掉，也没什么要务重任在身。陆游不禁自嘲道：“似闲有俸钱，似仕无簿书。似长免事任，似属非走趋。病能加餐饭，老与酒不疏。婆娑东湖上，幽旷足自娱。时时唤客醉，小阁临江藁。钓鱼斫银丝，擘荔见玉肤。檀槽列四十，遗声传故都。岂惟豪两川，自足夸东吴。但恨诗不进，榛荒失耘锄。何当扫纤艳，杰作追黄初。”他对官事没有多大兴趣，常常泛舟湖上，忘情酒中，与美人作伴，与朋友唱和。唯一在意的是诗歌没有长进，希望能有“杰作追黄初”。诗能扬名，诗能寄托、流传他的情志，这多少能给他一些安慰。但是诗给不了他实实在在的高官、厚俸、尊宠地位和丰功伟绩，所以他内心深处还是惘然若失的。

这年三月，参知政事郑闻出任四川宣抚使。陆游有《上郑宣抚启》，提出“当今秦蜀之权，重无与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犹未归”。希望郑闻“已庆登坛而授钺，遽观推轂而出师”。同时表达了“仰跂光躔虽阻服弓刀之役，铺张勋业或能助金石之传”的心愿。郑闻置之不理。七月，郑闻调回临安，四川宣抚使撤销，改派薛良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反映出朝廷

在西北以防守为主，无意用兵的意图。陆游再次上书，希望薛良朋随机应变，撑持西北大局，以图恢复大计，亦再次表示了“得裤服弓刀之役，虽恨迫于衰迟，曳裾陪簪履之尘，尚欣承于闲燕”的心愿。但中兴之盛只是他的美好愿望，南宋没这份实力，也渐渐丧失了信心与热情。薛良朋不会在意陆游的言论，更不会由此重视、提拔陆游。

陆游进言无用，倍加沮丧。这年八月蜀州阅武，他完全没了在嘉州时的豪情。从《蜀州大阅》一诗中所看到的，只是无限惆怅：“晓束戎衣一怅然，五年奔走遍穷边。平生亭障休兵日，惨淡风云阅武天。戍陇旧游真一梦，渡辽奇事付他年。刘琨晚报闻鸡恨，安得英雄共著鞭。”国事如此，自己的身事也就更可悲了。来到这偏远之地，不能有所建树，便如同贬谪，徒受其苦。当初来蜀就有所畏惮，心怀委屈，后来希望以一番新的作为来抹平这一切，谁知如今却让他更加厌倦和怨愤。当他看着长安图时，不由悲感交集：“许国虽坚鬓已斑，山南经岁望南山。横戈上马嗟心在，穿堑环城笑虏孱。日暮风烟传陇上，秋高刁斗落云间。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只有那些富有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的人，才会像陆游这样想象得到沦陷区人民的惆怅与怨恨。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惆怅，也是忧己向忧国的延伸。那些志得意满的人，那些苛图安乐的人，是不会为自己也不会为国事忧虑、惆怅的。

这年十月，陆游又改调荣州（今四川荣县）摄知荣州事。他绕道先去青城游览。青城山上有许多道观，最有名的是丈人观。丈人观的上官道人是一个奇人，陆游在《老学庵笔

记》中记道：“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暗，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与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勤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暗矣。”陆游在滚滚红尘中飘荡得心力交瘁，从这些异人异语中他体验到一种出世的奇趣，一时忘却了心中浮游旋转的尘念，得以轻松解脱。不过，“逝将从翁走如麋”只是厌世情绪的一种渲泄，离厌弃的距离还很远很远，而当这种情绪得以渲泄后，他又能够心平气和地回到尘世。

不同的景触发人不同的情感。在《登灌口庙东大楼观岷江雪山》一诗中，陆游抒写了另一种悲壮情怀：“我生不识柏梁建章之宫殿，安得峨观侍游宴。又不及身在荥阳京索间，擐甲横戈夜酣战。胸中迫隘思远游，溯江来倚暇山楼。千年雪岭阑边出，万里云涛坐上浮。禹迹茫茫始江汉，疏凿功当九州半。丈夫生世要如此，赍志空死能无叹？白发萧条吹北风，手持卮酒酹江中。姓名未死终磊磊，要与此江东注海。”这首诗中有两个长句，不仅使句式生动多变，更有长吟长啸、淋漓舒展的抒情功能，颇具太白的风韵、气势。“白发萧条吹北风”将抒情主人公壮心未已的形象活现出来，他持酒酹江，胸臆如潮，饱满激荡非东海之阔不能尽纳。“赍志空死能无叹”，这才是陆游的本来面目。他和李白都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可他们的豪言壮语，他们决不认命，永远激情澎湃的处世姿态，不仅能给后人以崇高的美感，更能给后人以精神的鼓舞。

陆游于十一月初到荣州。在这荒僻的地方，陆游自觉“身如林下僧，处处常寄包；家如梁上燕，岁岁旋作巢”。他在城西筑楼观一所，名叫高斋，并把家眷接来。仍然无事，以酒和诗词打发时光。一次宴后作《沁园春》词，倾吐自伤飘零，思归故国的心意。陆游已经对功业不抱多少希望了，只想回到故园，不再飘泊，更主要的，只要他还在外奔走，他就不能放弃幻想，他的心灵在希望与无望之间的磨难就不会终结，所以，归家是为了归心、安心。

可是，注定不能安心的诗人，也注定不得安宁。这年十二月，他又被调往成都任制置使参议官，除夕夜得檄文催赴任。“浮生岁岁俱如梦，一枕轻安亦可人。偶落山城无事处，暂还老子自由身。啸台载酒云生屐，仙穴寻梅雨垫巾。便恐清游从此少，锦城车马涨红尘。”正月十日，陆游不敢怀抱什么幻想地辞别了荣州，恍如梦游一般再次奔走在不知何处是尽头的官道上。

恃酒颓放

成都安抚置制使范成大，是陆游的老友，也是著名的诗人。他不把陆游作一般的幕僚看待，对他比较照顾。陆游随着范成大在办理公务之余，对名花，开夜宴，醇酒美人，音乐歌舞，应有尽有。尽管在范成大的庇佑下陆游过得很惬意，但他还是忘不了自己失落的梦。在《双头莲》一词中，他向范成大吐露自己的衷心：“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意。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身万里，旧社凋零，青门俊游谁记？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门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纵有楚梅吴檣，知何时东逝？空怅望，绘美菰香，秋风又起。”诗人喜欢悲歌、苦吟、伤时、叹老、哀失、悼亡，或道壮志、吐豪情、诉热爱、抒狂喜，无故还寻愁觅恨，或为赋新词强说愁，稍有由头，就会抓住不放，作为咏叹的题材，未必真是撇不下、放不开，有时只是为了在设想感动别人的同时感动自己。范成大自己也是个诗人，知道诗人的这番自觉不自觉的作态，当然不会太看重其中的意旨，而只会当一首词来欣赏，有雅兴或许和一首，没心情笑一笑赞两声便罢。

范成大也是一位有壮心的诗人。但在他那个位置上，看

到的、想到的实际情况更多，而更少空吟长叹，只是踏踏实实做好边防工作。成都原有筹边楼，是唐文宗时四川节度使李德裕所建。楼的四壁画有邻境山川险要图并标明邻邦人口、驻军情况，李德裕和熟悉边事的人天天筹画其上。后楼废。范成大另选址重建，请陆游作记。陆游在记中将范成大比李德裕，赞其有远谋。范成大说：“君之言过矣。予何敢望卫公，然窃有幸焉。卫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维州之功，既成而败。今予适遭清明宽大之朝，论事荐吏，奏朝入而夕报可。使卫公在蜀，适得此时，其功烈壮伟，讵岂取一维州而已哉！”可见范成大对自己的无所作为也是不满的，只是无可奈何。

朝廷没有大动作，四川方面自然也风平浪静。不安分的诗人在这种一汪死水的环境中感到压抑、狂燥。他的多余的热情和思绪要排遣，行迹上就不免颓放起来。他到处游玩，到处歌吟。“逐虏榆关期尚远，不妨随处得婆娑。”他放纵自己，在花草、山水、歌舞和醇酒美人中忘怀成败得失荣辱。

成都是一个海棠王国。陆游遍游成都的海棠园，作了许多海棠诗。“看花南陌复东阡，晓露初干日正妍。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颠。”“不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花阴扫地置清樽，烂醉归时夜已分。欲睡未成欹倦枕，轮囷帐底见红云。”“海棠已过不成春，丝竹凄凉锁暗尘。眼看燕脂吹作雪，不须零落始愁人。”

成都的梅花也颇盛丽。“锦城梅花海，十里香不断。”陆游经常与范成大去城西的浣花溪喝酒赏梅。“当年走马锦城

西，曾为梅花醉如泥。”

陆游到处游赏，每到一地每遇一事必吟诗。雨中登安福寺塔，他吟道：“平生喜登高，醉眼无疆界。北顾极幽并，东望跨海岱。喟然抚手叹，从古几成败。”游华严阁，观数千僧徒进斋，他又吟道：“拂剑当年气吐虹，暗鸣坐觉朔庭空。早知壮志成痴绝，悔不藏名万衲中。”行吟频频，其情泛泛，即景便生，谈不上是因景而生而融情入景，用语也很随意，只求将那层似深实浅的心意表达出来，完成了诗的形式，又有了可以感动自己和他人的情志，得到“又作了一首诗”的满足与快乐。至于炼字造意，就有点不管不顾了。如“自倚心眼大”的“大”字，是用得很粗俗的，“喟然抚手叹”五个字仅表出“叹”的意思，将诗写成了大白话，全无深长意味和丰富内涵。总之陆游是将诗散文化了，诗成了他的日记，有诗的形式，没有了诗的意境。他做的一些怀古人诗，如凭吊杜甫草堂时所作：“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锦里瞻祠柏，绵州吊海踪。”没有触及到杜甫的心灵、上升到人生与命运的高度，而只是随心寻访，淡淡怀想。游武侯祠后他也吟道：“凉凉隆中相，临戎遂不还。尘埃《出师表》，草棘定军山。壮气河潼外，雄名管乐间。登堂拜遗像，千载愧吾颜。”这些诗句也显得太直、太露，没有回味余地，比之杜甫《武侯祠》，真不可同日而语。

陆游最常去的还是酒肆和歌楼，他有时甚至把整个酒楼包下来，与友人赌博狂饮。芳华楼、万里桥这些地方，消磨了陆游的许多时光。“豪华行乐地，芳润养花天。”“风掠春衫惊小冷，酒潮玉颊见微赭。”“夜暖酒波摇烛焰，舞凤粉妆铄

华光。”这些诗句记下了他的形迹，反映了他自我疏放、及时行乐的心态。有时他也不满意自己的颓放，“颓然却自嫌疏放，旋了生涯一首诗。”他的颓放与一般人的寻欢作乐有所不同，那就是只要有符合他心意的事可做，尤其是有意义的大事、要事，他就会热情高涨；而既然没有，他便相反地极为消沉，以疏放来冲消不甘平庸的心念：“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识此心。”他内心深处还是希望经世立功的。《楼上醉书》反映了他颓放外表下的隐衷：“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救河山，岂知蹭蹬不称意，八年梁益凋朱颜。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中原机会嗟屡失，明日茵席留余潜。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一副自暴自弃的姿态。

陆游祖父精通医术，陆游从小即喜欢方药，在成都无大事、要务，他就利用祖传医术为贫病市民施药：“我游四方不得志，阳狂施药成都市。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疲民起憔悴。”由这件小事，可见他的济世之心未泯。

“狂奴故态有谁容？”陆游作为一个众目所矚的大诗人，人们看他的眼光有羡慕的自然也有嫉妒、反感的，他的心理和行为都不能为一般人理解，他的放旷姿态深为一些道德君子或正直之士所迷惑。他的不合时宜地恢复言论也让许多心虚气怯、不求上进的官吏恼怒。于是，陆游遭到了台官的弹劾，说他“不拘礼法”、“恃酒颓放”。当时的丞相龚茂良是主和派，对陆游没有多少好感。因此，淳熙三年三月，陆游被免去官职，移住浣花村，以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名义领取干俸。

陆游对这次被谪免官是很不满的。他表示不满的方式是不屑。《醉题》诗就是对那些排挤、攻讦他的人的笑傲：“裘

马轻狂锦水滨，最繁华地作闲人。金壶投箭消长日，翠袖传杯领好春。幽鸟语随歌处折，落花铺作舞时茵。悠然自适君知否？身与浮名若个亲。”直到六十八岁他回山阴闲居时，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宦游三十载，举步亦看人，爱酒官长骂，近花丞相嗔。湖山今入手，风月始关身。少吐胸中气，从教白发新。”陆游既因“恃酒颓放”罢官，索性自号“放翁”，坚持自己的个性和言行。

陆游罢官浣花村后，与范成大来往仍很密切。淳熙四年春，范成大以高价从天彭（今彭县）购得牡丹数百苞，请陆游来赏。陆游作《天彭牡丹谱》。《花品序第一》品第牡丹之等级，将状元红品为第一。“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第二部分《花释名第二》解释花名由来，介绍花之形、色。如介绍状元红：“状元红者，重叶深红花，其色与鞞红潜绯相类，而天姿高贵，彭人以冠花品。多叶者谓之第一架，叶少而色稍浅者谓之第二架。以其高出众花之上，故名状元红。或曰：旧制进士第一人，即赐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这些话简明而内容丰富，既具知识性，文采也极可观。《风俗记第三》介绍天彭养花的情况。最后，写与范成大等夜宴西楼、观赏牡丹：“烛焰与花相映发，影摇酒中，繁丽动人。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异时复两京，王公将相，筑园第以相夸尚，予幸得与观焉。其动荡心目，又宜何如也！”由天彭牡丹想起另一个沦陷异族手中的牡丹王国——洛阳，由赏花的美好愿望自然流露出恢复两京的热切期盼，同观牡丹的人观此文，都会心有戚戚的。《天彭牡丹谱》以知识性介绍为主，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

炉，给读者以多重收获、享受和触动，充分显示了陆游成熟的、多方面的文学才能。

范成大每逢盛事必请陆游来吟颂。他重修郡楼铜壶阁，完工后，仍请陆游作记。这种应制文章，非出胸臆，而要切合其事其景，切合主人身份、意旨，尤其为难。而陆游驾轻就熟，写得既称主人之心，又能把自己的观点、情怀融进去：“……夫岂独阁哉，天下之事，非先定素备，欲试为之，事已纷然，始狼狈四顾，经营劳弊，其不为天下笑者鲜矣。方阁之成也，公大合乐，与宾佐落之。客或举觞寿公曰：‘天子神圣英武，荡清中原。公且以廊庙之重，出抚成师，北举燕赵，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腥膻之污，登高大会，燕劳将士，勒铭奏凯，传示无极，则今日之事，盖未足道。’识者以此知公举大事不难矣，其可阙书。”此记既赞颂范成大的修复之功，更预期他的恢复之功。那时，恢复大业已成为悬在人们意识上空的一个遥远而又似乎伸手可及的梦，这个梦成了文人士大夫快乐、愁苦、激动、消沉等诸般情绪的凝结点和渲泄点，人们谈论它但不一定付诸行动，而又能从中找到一种心忧天下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如陆游的愁主要是因为羁身万里，老大无成，又遭罢免。而这种愁是个人的，是不足为他人道、不会为他人欣赏的，他不愿意流诸笔端，流诸笔端的只是为国为民的愁，为恢复大计的愁，这种愁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为时人后人称颂，而诗人心中的个人愁绪也藉此渲泄出来，以艺术的伪装获得了认同。陆游说范成大有恢复之志，这本身就是一种夸赞，即使范本人非常清楚这不可能，他也会感到得意。而在他自得之余，他也受到鼓舞、鞭

策。

陆游和范成大都是名诗人，他们之间的酬唱是少不了的。一次范成大生病，作《枕上》一诗：“一枕经春似宿醒，三衾投晓尚凄清。残更未尽鸦先起，虚幌无声鼠自惊。久病厌闻铜鼎沸，不眠惟望纸窗明。摧颓岂是功名具，烧药炉边过此生。”陆游和道：“放衙元不为春醒，澹荡江天气未清。欲赏园花先梦到，忽闻檐雨定心惊。香云不动熏笼暖，蜡泪成堆斗帐明。关陇宿兵胡未灭，祝君垂意在尊生。”以“胡未灭”来祝范成大“垂意在尊生”，即是将范的生命意义提高到国土恢复的高度上，如果对一个苟安的人说这话，那会形同讥讽，他会自惭不安而恼怒，而范心中是有此志的，所以就成了一种激励。

诗人情绪是起落不定的，尤其在闲居时。有时愁从中来，便触发诗兴，将这愁夸张到淋漓尽致的地步。陆游的《春愁》诗，就显然是一缕愁绪的无限发挥：“春愁茫茫塞天地，我行未到愁先至。满眼如云忍复生，寻人似疟何由避？客来劝我飞觥筹，我笑谓客君罢休。醉自醉倒愁自愁，愁与酒如风马牛。”愁像疟疾一样缠扰，酒也不能消解，何至如此呢？生活毕竟是丰富多采的，有喜亦有悲，可诗人总是把瞬间之喜推及永恒，又把点滴之愁充塞天地。范成大大对诗人的这种诗化心态是深有体会的。他作诗反其意相和：“东风本是繁华主，天地元无著愁处。诗人多事惹闲情，闭门自造愁如许。病翁老矣痴复顽，风前一笑春无边。糟床夜鸣如落泉，一杯正与人相关。”闭门造愁正中诗人要害。陆游无事可作，俸钱不多，不能纵情歌舞、醇酒中，所有浮思乱绪都闷积心中，就

酿造出许多未必是愁而莫可名状的愁来。

陆游闲居期间心情是迷茫烦乱的，像一个迷路的夜行人。他的诗中跃动着的就是一个漂泊迷茫的魂灵。试看《江亭冬望》：“霜落江清水见鱼，偶来徙倚草亭孤。雪天黯淡常如晚，烟树微茫直欲无。下泽乘车终碌碌，上方请剑漫区区。拟将疏逸消豪气，寻罢酒徒寻猎徒。”他所寻的既非酒徒也非猎徒，而是一个失落的梦，是失落之后的精神归宿。再看《华发》：“华发萧萧老蜀关，倦飞可笑不知还。人生只似驹过隙，世事莫惊雷破山。光景半销樽酒里，英豪或隐博徒间。车帷闭置真何乐，书剑飘然未厌闲。”倦飞、知还是陶渊明多次吟咏的主题。这个“还”，是否就是归家呢？不是的，归家是形式上的，放弃人生追求、归返精神家园才是其本质。陆游尚不甘心放弃。哪怕他在酒徒、赌徒间混迹，他也认为“英豪或隐博徒间”，不承认自己的沉沦。

当陆游暂时在野时，他更能清楚地看到为官者的种种腐败情形，并将其危害归结到恢复大计上。南宋之所以偏安，是由于整个宋朝军政颓废、积重难返，所以外患至时不堪一击。而现在“郡县轻民力，封疆博虏和”，犹不思进取，不励精图治，并反而在进一步腐败，这样恢复自然谈不上，偏安也未必能够长久：“安危自古有倚伏，相持默默非放情，棘门灞上勿儿戏，犬羊岂惮渝齐盟？”陆游由自身坎坷而生发的怨愤，逐渐转化为对当权者误国误民的不满与痛心：“贼势已衰真大庆，士心未振尚私忧。”他的私忧也就超越了小我的意义：“堂上书生读书罢，欲眠未眠偏断肠。起行百匝几叹息，一夕绿发成新霜。”南宋大小官吏腐化享乐，没有多少人能像陆游

那样忧怀着沦陷区百姓的疾苦。朝廷不为遗民作主，遗民就只有向苍天倾诉了。想到这些，陆游更加不满当朝的和守政策，在《关山月》一诗中悲愤地予以抨击：“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摧落月，三十从军悲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霄垂泪痕？”壮士徒然白了头发，遗民望眼欲穿，当权者却在歌舞中沉醉，鲜明的对比，真让诗人痛心疾首。在此诗人对和守政策的抨击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他以边缘知识分子的身份，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对当权者漠视民生疾苦、抛卸对国家、民族兴衰的责任作了深刻的批判。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就是由个人的坎坷推及众生的不幸，将个人的忧愤情绪转化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生的理性思考，升华为一种时代的情绪，成为广大人民的代言人，并对当权者的思想、行为构成舆论的影响、压迫、监督和调控。中国文人作为总体上的边缘人，以他们的思想、情绪进入了时代中心，这就是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所以尽管他们在当世可能并无实际作为，却受到时人的尊敬、爱戴和后人的追慕、缅怀。陆游在蜀中所作诗多寄意恢复，这是代表广大民众心愿的，也是南宋朝应该努力的方向，所以它们一旦流传，就超出了诗人个体生命的意义，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他个人的私念和心性行为上的某些不足毋庸因其是伟大诗人而讳言一样，他的颓放、他的为一家生计而求官、他的对长官的逢迎，乃至后来的为权臣韩侂胄唱赞歌，种种被视为不符人品理想乃至有损人格的行为，都不会

抹煞他的诗歌的意义。

淳熙四年五月，范成大奉旨召对，东归临安。陆游赠别：“平生嗜酒不为味，聊欲醉中遣万事。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君如高光那可负，东都儿童作胡语。常时念此气生癭，况送公归觐明主。皇天震怒贼得长，三年胡星失光芒。旄头下扫在旦暮，嗟此大议知谁当？公归上前勉画策，先取关中次河北。尧舜尚不有百蛮，此贼何能穴中国？黄扉甘泉多故人，定知不作白头新。因公并寄千万意，早为神州清虏尘。”诗人仍然系念着君主和在朝故人，系念着恢复大计，希望范成大回朝促劝君主北伐。他的这份执著，在当时很多人看来也许是执迷不悟，是不识时务，逆大流而行，冒朝廷上下之大不韪，可笑而可厌。然而，诗人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他一旦认定，就不会放弃，不会忘怀。诗人是无力回天的，可他的精神、他的意志，与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脉相承，激励着中国文人与命运抗争，为他们的时代鼓与呼。

范成大去后，陆游失了依靠，也失了一位诗友，“旧交渐少每酸辛”，心情更加不好。八月间，朝廷调任陆游知叙州（今四川宜宾）军州事，次年冬赴任。秋天，他和友人独孤策去八阵原打猎，夜宿农家，领略到一种乡野之趣。但快乐是短暂的，在《猎罢夜饮示独孤生》一诗中，他的感伤又流露出来：“客途孤愤只自知，不作儿曹怨别离。报国虽思包马革，爱身未忍价羊皮。呼鹰小猎新霜后，弹剑长歌夜雨时。感慨却愁伤壮志，倒瓶浊酒洗余悲。”他在外漂泊数年，一事无成，希望能被召还朝中，得到新的机会。但他个人的苦衷和报国的壮志都只有自己知道，这种悲愁是浊酒难洗的。“孤愤”一

词压抑无比、强烈无比，他愁而无人解其愁，他悲而无人知其悲，他愤而无人理解其愤，是最让人痛苦不堪的，是一种无从解脱的自我折磨。

诗人既常自我折磨，也善自我解脱。年底，他遇到老友张季长，情绪又高昂起来。《次韵季长见示》一诗恢复了豪气：“倚遍南楼十二栏，长歌相属寓悲欢。空怀铁马横戈意，未试冰河堕指寒。成败极知无定势，是非元自要徐观。中原阻绝王师老，那敢山林一枕安。”在这首诗中，诗人不是一味抒情，而是带着冷静的思考。空怀壮志，不曾亲试身手，即使得到机会，也成败难料，时世、命运违己还是自己违世逆命有待徐观，不能一味怨天尤人。尽管如此，诗人还是慷慨表示：中原未复，王师空老，自己决不能放弃努力，不敢“山林一枕安”。前六句平缓沉静，而诗人胸中蕴积的浩气，在末二句一下喷发出来了，全诗格调为之一振，让人仿佛看到一度萎靡的陆游，又高高地站了起来。

淳熙五年正月，就在陆游正准备去叙州的时候，他得到了召还临安的消息。陆游看到了生命中新的曙光，但流落蜀地七载，盛年已过，又不禁悲哀。《东归有日书怀》表白了这种悲喜交集的心情：“万里桥边白版扉，三年高卧谢尘鞅。半窗竹影棋僧去，满棹萍风钓伴归。看镜已添新雪鬓，听鸡重拂旧朝衣。故人零落今无几，华表空悲老令威。”几度沉浮，饱经沧桑，诗人不会再轻易狂喜狂悲了，而是在喜悦中也带着几分担忧。以后会不会顺利呢？他有些茫然，在离蜀之际，吟出一首《南乡子》：“旧梦寄吴墙，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烟树参差认武昌。愁鬓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

香，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经验给了他一种不会顺利的预感，何况，这几年他失去的已经太多了，又有什么可狂喜的呢？

宦路九折

淳熙五年（1178年）二月，陆游离开成都，买舟东下。一路风光，一路诗情。边游边吟，七月份，陆游到达临安。阔别九年，朝中人事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朝久凋谢，存者不十一”。老友在朝的只有翰林学士兼侍读周必大、吏部尚书韩无咎。范成大已于六月罢归奉祠去了苏州石湖。这时他认识了当时的名诗人尤袤，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赵昚在陆游归来后即召对于便殿。当时曾觌以使相领京祠，与知阁门事王抃等招权植党，排斥异己，陆游昔日曾进言废曾觌，现在当然难以在朝立足。于是，他被外放为提举福建路常平盐茶公事，治所在建州（今福建建瓯）。他先回山阴休息。家园让他感到宁静温馨，感到一阵发自生命源初的欢愉。他已不愿再出外奔波了，可是身不由己。《归云门》一诗，反映了他此际的心情：“万里归来值岁丰，解装乡墅乐无穷。甑炊饱雨湖菱紫，篾络迎霜野柿红。坏壁尘埃寻醉墨，孤灯饼饵对邻翁。微官行矣闽山去，又寄千岩梦想中。”

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又称仓司，是监司官的一级，职务较高。但这离陆游“至君尧舜上”的旧梦仍然遥远，而诗人总是不能满足现实，易生厌烦的，所以他的情绪仍然低落。

从《送钱仲耕修撰》一诗可见他这时的心境：“姑熟溪边识胜流，十年重见岂人谋。自应客路难为别，不是阳关作许愁。偶直公看鳖禁月，倦游我梦镜湖秋。殷勤为报中朝旧，睡足平生是建州。”陆游的诗里，豪情少了，暮气多了，同时浮华的成分也少了，多了几分杜诗的沉郁顿挫。内涵更丰厚，意境也饱满起来，这是因为他在逐渐失去幻想之后心中越来越有所郁积，越来越用心去写诗而不是为诗而诗的缘故。

这时他常常怀念在蜀地的生活。并不是真的留恋蜀地，而是生活中没有寄托，只有在回忆中寻找喜怒哀乐。在建州既无好友，又无好景，所以对昔日的欢乐怀想不已。如《雪晴至后园》诗所言：“宝马东风拥犊车，碧鸡坊里擅豪华。南来强作寻春梦，何处如今更有花？”

诗人也常常想起故园，故园从来不是人最向往的地方，但它是人最初也是最后的居所，只有它天然能让人感到安宁，尤其是在叶落归根的季节。故园总是人在外闯荡、飘流时的精神依靠，是人的思绪在无所寄托时的最后寄托，人得意时不会忘了故园，人失意时更是渴望归返故园。陆游“西州落魄九年余”，“今年建州更愁绝”，于是就更觉得家乡好了。在《思故山》一诗里，他尽情赞美着家园，抒发着乡情，暂忘了羁身异地、飘零寂寥的愁苦。“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湖山奇丽说不尽，且复为子陈吾庐。柳姑庙前鱼作市，道士庄畔菱为租。一弯画桥出林薄，两岸红蓼连菰蒲。陂南陂北鸦阵里，舍西舍东枫叶赤。正当九月十日时，放翁艇子无时出。船头一束书，船后一壶酒。新钓紫鳊鱼，旋洗白莲藕。从渠贵人食万钱，放翁痴腹常便便，暮归稚子迎我笑，遥

指一抹西村烟。”

建州是一个产茶区，出产上品腊茶，陆游有诗《建安雪》歌咏福建名茶：“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小雪。雪飞一片茶不忧，何况蔽空如舞鸥。银瓶铜碾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

陆游仍然不时作一些咏志诗，不过显得有气无力。“刺虚腾身万日前，白袍溅血尚依然。圣时未用征辽将，虚老龙门一少年。”诗人未有任何值得自豪的征战经历，空抒杀敌报国的志愿，自然缺乏底气。而作为接受主体，读诗的同时也在读人，很难从这些诗中感到内在的力量和外在的气势。

龙门少年指薛仁贵，曾随唐太宗征辽。陆游借此说明自己未被重用，虚度年华。在《婕妤怨》一诗中，他借美人之怨表现被君主遗弃不用的不满，并委婉地表白了自己的忠心：“妾昔初去家，邻里持车箱。共祝善事主，门户望宠光。一入未央宫，顾盼偶非常。稚齿不虑患，倾身保专房。燕婉承恩泽，但言日月长。岂知辞玉陛，翩若叶陨霜。永巷虽放弃，犹虑重谤伤。悔不侍宴时，一夕千干觞。妾心剖如丹，妾骨朽亦香。后身作羽林，为国死封疆。”这首诗情辞哀切，凄美动人，但是，赵昀不一定能读到，即使读到也不会因此擢用他，因为这毕竟只是一首艺术作品，与政治才能和忠心赤胆不是一回事。诗人幻想能感动别人，实际只能感动自己。

“无功耗官廩，太息负平生。”在这无所事事的日子里，陆游开始搜集碑帖。他搜集到《汉隶》十四卷。都是中原和吴蜀真刻。请书法家方士繇亲视装裱。他写了《跋汉隶》记载此事。他又将书画运回山阴，准备告老带乡。作《白发》诗，

吐露归心：“白发千茎绿鬓稀，卧看鹧鸪刺天飞。平生窃鄙贡公喜，故里但思陶令归。清坐了无书可谈，残年惟有佛堪依。君看世事皆虚幻，屏酒长斋岂必非。”这首诗写得平静而低沉，表明诗人的归心不再是一种情绪，而是人之将老、再也看不到前途时的自然而然的冷静而无奈的决定。

秋后，诏书下，召陆游回临安。陆游经建阳至武夷山，有《泛舟武夷山九曲溪，至六曲，或云：“滩急难上”，遂回》诗：“一叶凌风入硤来，山童指点几崔嵬。急流勇退平生意，正要船从半道回。”此诗一语双关，表明他退出仕途的意愿。北上行至衢州时，上奏请求罢免和奉祠。不久诏书下，未准奉祠，改调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治所在抚州（今江西临川），勿需入都，陆游无可奈何，只好又辗转到了抚州。

陆游年纪大了，又常生病，“筋力疲于往来，疾恙成于忧畏”，心情也愈来愈坏了。但他仍勉力处理公务。当时茶盐属于官府专卖，高额税收使茶户盐户几乎破产。所以茶民、盐民常常贩私盐和闹事。“朱墨纷纷讼满庭”，陆游花了很大精力来处理种种诉讼。陆游虽然厌烦，但仍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个人的运乖命蹇，使他对普通百姓更加深怀同情。这也是诗人与一般官僚的不同。他曾经碰到一件案子，在他的辖治范围内，筠州百姓陈彦通，受高安县押录陈谅欺侮，上告民府。他听说陈谅曾经被治过两次徒杖罪，按法令规定不得重入官府，如改名换姓投募充役，这叫“冒役”，是一条罪状。陈彦通在状纸中附带提出这条罪状，而官府认为陈彦通冒役一事不实，于是按“反坐”之法（即以诬告治罪）将他脊杖十三。陆游为陈彦通鸣不平，上书力陈自己对此案的看法和

有关法治的认识：“臣窃详反坐之法，本谓如告人放火，而实不曾放火，告人杀人，而实不曾杀人，诬告善良，情理重害，故反其所坐。然有司亦不敢即行，多具情法，奏取圣裁。今愚民无知，方其为奸胥猾吏之所屈抑，中怀冤愤，诉之于官。但闻某人曾以罪勒罢，又有许告指挥，则遂于状内夹带冒役之语。村野小民，何由身入官府，亲见案牘，小有差误，亦当未减，以通下情。纵使州郡欲治其虚妄募越之类，亦自有见行条法，笞四十至杖八十极矣，与反坐之法有何干涉。若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摺摭，置之徒罪，则百姓被苦，岂复敢诉。吏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为政者，莫不严于驭吏，厚于爱民。今乃反之，事属倒置。兼见今诸处冒役吏人，虽究见是实，亦不过从杖罪科断罢役而已，未有即置之徒罪者，岂有百姓诉吏人冒役，却决脊杖之理，臣本欲即按治筠州官吏，又缘有上件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陈请列指挥，显见因此陈请，致得州郡凭借，用法深刻。”最后，他请求赵昀严惩不法之徒：“臣蒙恩思遣使一路，出自圣知拔擢，苟有所见，不敢隐默，欲望圣慈，更赐详酌，如以臣所奏为然，即乞特降睿旨，寝罢乾道六年八月二日因臣僚陈请所降指挥，庶使百姓不致枉被深重刑责。且下情获通，胥吏稍有畏惮，天下幸甚。”

从陆游的这份《奏筠州百姓陈彦通诉人吏冒役状》来看，他不仅深通法理，对法治和为政之道有深刻的见解，而且他能够公正无私，不官官相护，能站在平民一边，这是非常可贵的。“若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摺摭；置之徒罪，则百姓被苦，岂复敢诉”，这句话可说是击中了历朝法律重官轻民

的要害。不仅“刑不上大夫”一直变相、隐形存在，而且由于官民地位不同，他们在法律面前的优劣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陆游提出“严于驭吏，厚于爱民”的论点，即使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民告官无论如何都是不容易的事，他们要打赢与官吏的官司总有种种看不见的障碍。只有严于驭吏，打掉贪官污吏、不法之徒的威风，普通百姓才敢申冤，才敢“以民告官”、“以下犯上”，才真正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地位。

淳熙七年四月，天气亢旱。陆游亲自去求雨。不料雨来之后就一直不停，以致酿成水灾。赈灾是陆游的职责，他立即拨义仓粮，命船载至灾区，同时命地方官迅速给灾民发放粮食。这年冬，他到灾区视察灾情，为灾民忧心忡忡，对各级官吏赈灾不力深为痛恨。这些都反映到他诗中：“小雨催寒著客袍，草行露宿敢辞劳。岁饥民食糟糠窄，吏惰官仓鼠雀豪。只要闾阎宽箠楚，不须亭障肃弓刀。九重屡下丁宁诏，此责吾曹未易逃。”可见陆游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官员，更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父母官。而这些在治世或无事之世是尤为难得的。有责任心才会爱民，而爱民的官员古往今来又有多少呢？

陆游在抚州还将宦游四方搜集到的药方精选出一些刻印成书，这也是一件利民的善举。

十一月，陆游接到诏书入京面对。行至严州时，给事中赵汝愚对他提出弹劾，可能是因他赈灾时未上奏先拨义仓粮，也可能与他在蜀时的一段浪漫生活有关。“后出蜀，携成都妓荆为尼而与归”。总之，赵昀又下诏令不必入奏，以主管成都府玉局观名义回京养老。陆游得旨又喜又悲，悲的是不能面

见君王有所擢拔，喜的是能够回到久别的家乡，而且有一份干俸。这番心情由《行至严州寿昌县界得请许免入奏仍除外官述怀》一诗可见：“晓传尺一到江村，拜起朝衣渍泪痕。敢恨帝城如日远，喜闻天语似春温。翰林惟奉还山诏，湘水空招去国魂。圣主恩深何力报，时从天末望修门。”虽然他常有归心，一旦真的离开仕途，还是有所不甘的，何况又不是功成身退。这也是一种“围城心态”。“宦游何啻路九折，归卧恨无山万重。”他既有解脱后的轻松，更有被抛弃的失落。

淳熙七年（1180年）末，陆游回到故里。奇丽的湖山不能消除他心中的失落和不平。“无才屏朝迹，有罪宜野处。平生万里心，收敛卧环堵。”这番自责自贬的话实含反意。“放翁白发已萧然，黄纸新除玉局仙。”他对自己的空衔苦笑不已，作诗调侃说：“玉局祠官殊不恶，衔如冰清俸如鹤。酒壶钓具常自随，五尺新篷织青箬。倚楼看镜待功名，半世儿痴晚方觉。何如醉里泛桐江，长笛一声吹月落。蒋公新冢石马高，谢公飞旆凌秋涛。微霜莫谴侵鬓绿，从今二十四考书玉局。”

陆游的身子在山阴，他的心却常常飞往朝廷，飞向中原。从《冬夜不寐至四鼓起作此诗》中可以看到他的不服老、不怕老：“秦吴万里车辙遍，重到故乡如隔生。岁晚酒边身老大，夜阑枕畔书纵横。残灯无焰穴鼠出，槁叶有声村犬行。八十将军能灭虏，白头吾欲事功名。”诗人喝过了闷酒，躺在床上，夜深不寐，也无心看书了，一本本散乱在枕边，他呆呆地看着已经没了焰火的残灯，昏暗中老鼠从洞里爬出来探头探脑。他静静地听着窗外橘叶发出的声音，那是村犬不甘寂寞的在夜间游荡。在这沉寂的夜间，他想起了什么呢？他想的是，唐

朝老将李世勣八十岁还下辽东，自己才五十六，仍然还有立功希望。诗人总是不愿放弃幻想，总能从现实中，从历史中，从他人那里，从自己记忆中，甚至从神话里为自己的幻想找到证明找到依托。“残灯无焰穴鼠出，橘叶有声村犬行”，是极为静谧安恬的乡间夜景，穴鼠、村犬之动衬出了夜之静，而这静又更衬出了心之动。这一切与残灯欲尽又都有关。人生如灯，诗人由灯无焰联想到自己，一生没放出什么光彩，如今更是黯淡。他的悲意激发了他的豪气，于是再度张开幻想之翼，在这孤村寂夜里翩跹起舞。五、六句既是荒村寒夜的实景，更是经过诗人情绪无意识选择的特色情境，融情入景，融思入景，情思与景天然妙合、浑然一体，是非常难得的佳句。

回忆在南郑前线的生活是最让陆游愉快也最让他伤感的。“老夫壮气横九洲，坐想提兵西海头，万骑吹笳行雪野，玉花乱点黑貂裘。”那是一段热火朝天、有声有色的生活，但遗憾的是他毕竟没有什么具体的、值得回顾和自豪的作为。

在不堪回忆和幻想的困扰之际，陆游也去山水田园间寻找乐趣。他有时去游云汀山，有时去佛寺道观闲逛，更多的时间则花在自家的小园里。他作有《小园》四首，是一组优美的田园诗：“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枯阴阴一径斜。臣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历尽危机歇尽狂，残年惟有付耕桑。麦秋天气朝朝变，蚕月人家处处忙。村南村北鹑鸣声，水刺新秧漫漫干。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少年壮气吞残虏，晚觉丘樊乐事多。骏马宝刀俱一梦，夕阳闲和饭牛歌。”陆游在梦幻不断破灭后，才深刻体会到了田园之趣，

因而才更能领略到陶诗的恬远意境，更加理解陶渊明似闲适实忧闷、化忧闷为安然的心境。卧读陶诗，隐隐察觉了其真意，便乘着微雨去锄瓜，以体会陶渊明南山锄豆的意趣。陆游和陶渊明，跨越数百年历史，在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轨道达到了心灵沟通。

陆游归来的头一年不断生病，秋天又患了疟疾，身体很不好。第二年渐渐康复，沉浸书中打发时光。他将家中藏书加以整理，给藏书处命名“书巢”，作《书巢记》。这是一篇包含着几分苦涩的幽默散文，也可见出陆游当时的生活情形和心境。“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曰书巢。客有问曰：‘鹊巢于木，巢之远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袭人者。风之巢，人瑞之。泉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夺燕巢，巢之暴者也。鸠不能巢，伺鹊育雏而去，则居其巢，巢之拙者。上古有有巢氏，是为未有宫室之巢。尧民之病水者，上而为巢，是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穷谷中，有学道之士。栖木若巢，是为隐居之巢。近时饮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则又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户墙垣，犹之比屋也，而谓之巢，何耶？’”这段话界定了“巢”的含义，从而引出对这个古怪名字的质疑及下一段的解说：“陆子曰：‘子之辞辩矣，顾未入吾室。吾室之内，或栖于椽，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觉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风雨雷霆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末

段陆游发出“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吾侪未造夫道之堂奥，自藩篱之外而妄议之，可乎？”的感叹和议论，但他内心更深处的慨叹，则是为书生困于书斋，不得施展，不为人知的窘况而发。在《书生叹》一诗中，他对书生也是对自己为书所误的可悲人生予以无情讽责：“可怜秀才最误计，一生衣食囊中书。声名才出众毁集，中道不复能他图。抱书饿死在空谷，人虽可罪汝亦愚。”在这种“衣食囊中书”的自讽里，隐含的是对“众毁集”的讥怨，“汝亦愚”的指责，是对“人之罪”的更强烈的愤恨。书生，或说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才能脱离了时代的需要，代表着未来的价值，而在当世不足为自己谋取现实利益；而当世又并不重视或看不到他们的未来价值，不仅不保护、帮助他们，有时反而排斥、打击他们，他们飘浮于理想中，未能立根于现实，当然就不堪一击了。陆游看不到这些，只是感到压抑、怨愤。他是挣不出中国文化人的命运轮回的，除非他腾达为王侯，或沦落为村夫。而他的心已是一颗文人心，所以他注定有万劫不复的苦恼和焦虑。

陆游回到农村，耳闻目睹农民生活的艰难，更加同情下层平民。淳熙八年浙东发生饥荒。时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陆游寄诗与朱，希望他早来赈灾，宽限征科。朱熹也是一个正直爱民的文人官员，在他的努力下，浙东灾民勉强度过了荒年。

陆游在山阴消息闭塞，但仍关心国事，尤其是金朝动向。淳熙十一年四月金世宗去辽阳会宁府，命太子守国，传至陆游耳中成了金朝内乱，金主逃遁。陆游作《闻虏酋遁归漠

北》，兴奋地期待“筑坛援钺”、出兵收复失地。另一首因误传消息而作的诗《闻虜政衰乱，扫荡有期，喜成口号》，本系金主以上京地寒之故让宋停贺生辰使、正旦使一年，宋人便捕风捉影地以为金朝发生内乱。陆游的这类诗或诗中这类句子，看来似乎好笑，但可见陆游恢复故土的心情之迫切，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南宋人的心态，盼望金朝衰败，恢复便有希望，盼之过切，就不免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一些“好”消息来。

淳熙十三年（1186年）春，陆游主管成都玉局观任期将满，陈乞再任，未获允准。经丞相王淮推荐，起用陆游为朝请大夫权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军州事。三月陆游应召去临安面对，住在西子湖畔。闲居五年，已经没了多少做官的热情和建功的幻想，如今命运又给他一个转机，让他已经趋于平静的心灵再度泛起波澜。他百感交集，作《临安春雨初霁》一首：“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经过数番挫折，他的热情已经内化为对人生成败得失的从容、淡然。重返京华，他的心情是无法平静的，他一夜不眠，他想的不是都城的繁华，不是面君的荣宠，而只是明朝深巷里将有人捧着新洗后百般清丽的杏花叫卖。一夜春雨，一枝红杏，让他忘记了几十年的仆仆风尘，忘记了身前身后的荣辱得失。品茗作草，闲适自得，他的神思已经飞向了家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联名句，千百年来深为人所喜爱。一夜春雨洗尽的不只是世尘更是心尘，使人有了澄明空灵的心境，而后才能无所挂碍地从一声接一声、渐近又渐远的卖花声中，想

象到烂漫红杏所焕发出的盎然春意，领略到那种闲远而清雅的意境。

陆游为上朝面对准备了三道《上殿札子》。第一道申陈民间疾苦，主张抑富济贫：“凶所饥岁，虽贫富俱病，然富者利源至多，贫者惟守田亩，孰为当恤？视郡县之庭，鞭笞流血，桎械被体者，皆贫民也。”“郡县之政，治大姓宜详，治小民宜略；赋敛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之事，宜覈大商。”这种均贫富的主张，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来说很有针对性。历代社会动乱的根源就是贫富不均，一至凶年矛盾激化便引起政治危机。由此可见陆游既有恤民之心，亦有清醒深刻的政见。

另两道札子主张选拔人才，积极备战，并伺机收复。他对形势的分析，他所提出的方略，都很有可取之处，显示出他政治见识的成熟。但赵昶既无心进取，也看不到这些，把他当一个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老臣，一位不大安分的名诗人，只对陆游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陆游离临安前去告辞，赵昶又说：“严陵清虚之地，卿可多作文。”在他看来，给陆游一份俸禄，让他去一个风景好的清虚之地，已是莫大的恩典了，却根本不理解陆游报国建功的一贯心志。

三月，陆游回到山阴，准备赴任严州。

扁舟又向镜中行

淳熙十三年（1186年）七月三日，陆游来到严州，管理一州军民工作。虽然诗人的天性不愿为太多杂务所缠绕，他有“困于吏役，悒然不乐”的感觉，但他还是愿意为一州百姓尽心尽力的。严州是一个较为贫瘠的山区，陆游来时尚又正逢荒年，“郊墟歉岁萧条后，风雪穷冬惨淡中。”陆游很是着急，上书朝廷请准蠲免租役，广行赈济。同时，他积极促进农业生产，号召州民力耕疾耘，争取丰收，并和人民相约“太守亦当宽期会，简追胥，戒兴作，节燕游，与吾民共享无事之乐，而为后日之备”。

陆游来严州的第二年冬天，下了大雪，陆游作《屡雪，二麦可望，喜而作歌》，描画出一幅岁丰民乐的美好图画：“苦寒勿怨天雨雪，雪中遗我明年麦。三月翠浪舞东风，四月黄云暗南陌。坐看比屋欢腾声，已觉有司宽吏责。腰镰丁壮倾洞里，拾穗儿童动千百。玉尘出磬飞屋梁，银丝入釜须宽汤。寒醅发剂炊粳裂，新麻压油寒具香。大妇下机废晨织，小姑佐庖忘晚糗。老翁饱食笑扪腹，林下击壤歌时康。”陆游对百姓的爱心和责任心使他从大众的欢乐中感到了欢乐，从为大众劳心的事业中得到了寄托。这样，他便摆脱了那种书生式

的极端个人化和没有植根现实因而变幻不定的情绪，活得实实在在。

宋金相持已久，南宋朝廷上下日益苟安忘耻，惰性深重，让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淳熙十四年周必大拜右丞相，向赵昚首奏：“今海内宴然，殆将二纪，此正可惧之时，当思经远之计。”陆游不仅有“时玩久安，辄生天下之患；国无远略，必有意外之虞”的共识，更有收复中原的宿愿，所以也时刻不忘北伐，“羽林百万士，何日闻北伐？贼臣官有守，不敢叫行阙。”他自己时时吟叹，还寄诗给周必大，提出“汉虏不应当常自守，期公决策画云台”。对于当时政府流行的“弭兵”的论调，他感到非常愤慨：“天地固将容小丑，犬羊自惯渎齐盟。蓬窗志抱横行略，未敢随人说弭兵。”如果说以当时形势不宜出兵，弭兵之说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压根就不想用兵，不作这方面准备，苟和畏战，那就是误国误民的短见浅识了。周必大并不主张立即用兵，但他有备战的远见和恢复的远志；陆游不在其位，以一个诗人的立场，代表民众的心愿，积极鼓倡北伐，至少在进取的姿态这一点上是有意义的。正因有许多陆游这样充满热情的人，南宋小朝廷弥漫着的惰性才不致无限扩大。

淳熙十四年十月，太上皇赵构去世，金朝派一使者来吊祭，“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有血性的朝臣莫不义愤填膺。陈亮给赵昚上书请求绝金北伐，并建议先经营建业，作为北伐的准备。但不为赵昚采纳。陆游纵笔疾呼：“故国吾宗庙，群胡吾冠仇，但应坚此念，宁假用它谋？望驾遗民老，忘兵志士忧。何时闻遣将，往护北平秋。”国事如此，

他怎么可能安心做一个州官呢？一个州官是难以有所大作为的，“书吏征租笑自忙”，“精力虚捐簿领间”，他不由时常生出厌倦情绪。

在严州，慕名向陆游学诗的人很多。陆游不仅悉心指导他们，对那些经济拮据的江湖诗人还慷慨周济，“江湖诗客群叩其门，倾箱倒囊赠施之，无吝色。”扶掖后进，表现出一位大诗人的宽厚胸怀。

这期间，陆游在严州开始刻诗集，名《剑南诗稿》。所收诗止于淳熙十四年。他对诗进行了一次严格的删定。据他自己说：“此予丙戌以前诗二十之一也。及在严州，再编又去十之九。”丙戌是乾道二年，陆游诗稿中留下这以前的诗作九十四首，机械计算，他在丙戌以前共作一万八千多首诗，数量惊人，而他删削的勇气也惊人。这说明他对作诗的态度还是严肃的。《剑南诗稿》此时收入共二千五百首，分二十卷。刻成流传后，文坛为之轰动，时人纷纷给予高度评价。杨万里作诗赞道：“今代诗人后陆云，天将诗本借诗人。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门人天台戴复古也说：“李杜陈黄题不尽，先生摹写一无遗。”将他视为继李杜陈黄之后的伟大诗人。

淳熙十五年（1188年）四月，陆游任期将满，上书乞复就玉局祠禄。赵昀未准。七月十四日，陆游卸任回到山阴。在严州凡七百日，“居官多惠政，既去而民思之”。

陆游在严州任上时，朝中谗谤他的人很多，这既是他诗名日高、树大招风的缘故，也与他执于事理、不通人情有关。他说：“自我来桐江，实无负悍嫠。谗波如崩山，孤迹则已危。”

非常烦恼和困惑。回山阴后，一方面他畏惧谗言，厌倦官场，打算“闭门教子孙，志愿真永毕”；一方面又不甘心无功而退，表示“长缨果可请，上马不踌躇”。

关于陆游继任新职的问题，朝中意见分歧。朝中能为陆游说话的人不多。但赵昚赏识陆游的诗文，周必大又是陆游的老朋友，暗中还是向着陆游的。淳熙十五年十月，赵昚和周必大商议：“陆游除郎不致烦言否？恐或有议论，且除少监如何？”周必大回奏众论谓“处以闲曹如驾部之类，亦足示陛下不弃才之意”，“只与外任，亦无不可”，“圣意若留陆游作少监，偶李祥现乞外，自可令填此阙。”这年冬天，陆游去临安面君，赵昚称赞说：“卿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所及。”陆游遂补李祥之缺任军器少监。

军器监掌管制造御前军器，少监是军器监的副职，比较清闲。陆游除了上朝、陪祭、送往迎来外，便在监中和同僚们闲谈。“五客围一炉，夜语穷幻怪。或夸雷可斫，或笑鬼可卖；或列混沌初，或及世界坏；或言修罗战，百万起睚眦。余谈咨搜抉，所出杂细大。”纵谈鬼神，荒诞不羁，可见监中生活的无聊。

淳熙十六年二月，赵昚传位于皇太子赵惇。在内禅前一日，赵昚手批陆游迁朝议大夫尚书礼部郎中。四月二十六日，光宗赵惇赴景灵宫，陆游以礼部郎中兼膳部检校，掌进供酒膳和赐公卿酒食等事。五月，诏修高宗实录，光宗命群臣齐集文华阁，进行撰述，陆游以第一名入选，兼实录院检讨官。

陆游对新即位的光宗提出了一些切中时弊的意见，如用人不偏、赏罚公正、节减用度、减轻赋税等，表现出一份老

臣拳拳之心。但是光宗既无能力，亦无励精图治的心愿，反而“宴游无度，声乐不绝，昼之不足，继之以夜。宫女进献不时，伶人出入无节，宦官侵夺政权，随加宠赐，或至超迁”。陆游非常失望，也就懒得多言了。当时张镃经常向他讨教诗艺，记述他与陆游交往的情形说：“有口宁论黠与痴，相投无过只谈诗。”

这年五月，周必大罢相，尤袤被指为周必大一党，也被免官。陆游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他喜欢言事，又是周、尤的朋友，所以深为一班佞幸小人所忌。这年十二月，谏官弹劾陆游“前后屡遭白简，所至有污秽之迹”，光宗遂下诏将陆游现任官职罢去，以中奉大夫、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奉祠。关于这一次的罢免，陆游曾有小诗四首，序云：“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嘲咏风月是治陆游罪的一个借口，正如今天以生活作风整人的政治手段一样，将不可说的原因掩饰过去。所以陆游心中是愤愤不平的。以风月命名小轩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他在两首绝句中进一步表明了这种抗议：“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放遂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绿蔬丹果荐瓢尊，身寄城南禹会村。连坐频年到风月，固应无客到我家。”

这一次的罢免使得陆游心灰意冷了。他在《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一诗中说：“斋戒叩头笺天公，幸矣使我为枯蓬，枯蓬于世百无用，始得旷快乘秋风。此身安往失贫贱，白发萧萧对黄卷，今人虽邻有不覿，古人却向书中见。猿啼月落青山空，旧隐梦寂思东蒙，不愿峨冠赤墀下，且可短剑红尘

中。终年无人问良苦，眼望青天惟自许，可怜对酒不敢豪，它日空浇坟上土。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渡江诸贤骨已朽，老夫亦将正丘首，杜郎苦瘦帽掀耳，程子久贫衣露肘。君复作意寻齐盟，岂知衰儒畏后生，大篇一读我起立，喜君得法从家庭。鲲鹏自有天池著，谁谓太狂须束缚，大机大用君已传，那遣老夫安注脚。”沮丧无奈之中，也有一种看透世情后的超脱。诗人对人生认识的成熟使他对诗文的认识也成熟了，“文章最忌百家衣”，关键在形成个人风格，“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有了丰富的生活体验，有了独到的人生见解，就有了自信，这是“气”的根本。光是少年壮志，那种气是浮的，陆游屡经挫折，锐气磨落，胸襟反倒开阔、充实起来，有了浩然之气，吐出便是沉雄之句。

陆游回到镜湖三山后，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他在家世的传统中，仿佛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富贵苛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文人之性本不愿与人争，况且他已六十五岁，更是希望独善其身，不在莫测仕途招惹祸端。

陆游居所原有草屋十余间，这次归来着力整治家园，新建十几间茅屋。他在住所东边湖滨买了三亩大小的山园，广种花木。又开药圃、蔬圃，取名东篱。他还种了十亩竹，上百株桑，在竹间修小庵两间，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意，命名老学庵。著有《老学庵笔记》十卷。作有《题老学庵壁》一首诗：“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茅只数椽。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太平民乐无愁叹，衰老形枯少

睡眠。唤得南村跛童子，煎茶扫地亦随缘。”他的诗中更多了一些苍老和豁达的成分，也透出几分恬淡。在《东篱记》中他详尽描写了自己生活的一个侧面：“放翁告归之三年，辟合东茆地，南北七十五尺，东西或十有八尺而赢，或十有三尺而缩，插竹为篱，如其地之数。埋五石瓮，潄泉为池，植千叶百芙蓉，又杂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东篱，放翁曰婆娑其间，掇其香以臭，撷其颖以玩，朝而灌，暮而锄。凡一甲坼，一敷荣，童子皆来报惟谨。放翁于是考《本草》以见其性质，探《离骚》以得其族类，本之《诗》、《尔雅》及毛氏、郭氏之传，以观其比兴，穷其训诂，又下而博取汉、魏、晋、唐以来，一篇一咏无遗者，反复研究古今体制之变革，间亦吟讽为长谣短章、楚调唐律，酬答风月烟雨之态度。盖非独娱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书，末章自小国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盖真足以致此。呜呼！吾之东篱，又小国寡民之细者欤？”

陆游自称家中“百口同饭糗”，“百口”是诗歌惯用的虚指，实际没这么多。田近百亩，婢仆十余人。他自称“出仕三十年，不殖一金产”，一者他不是贪官，二者他好游玩、宴饮，花费掉了。生活费用的来源，是靠地租和祠禄。陆游返家后的前十年都领有祠禄，其诗中说：“黄纸如鸦字，今朝下九天，身居镜湖曲，衔带武夷仙。日绝丝毫事，年请百万钱。恭惟优老政，千古照青编。”到庆元五年，他七十五岁时，按例可以老致仕，领半俸，但须自请。陆游怀着“扫空薄禄始无愧”的心情“忍贫辞半俸”，没有请领。其《病雁》一诗说：

“芦洲有病雁，雪霜摧羽翰。不辞道路远，置身湖海宽。稻粱亦满目，鸣声自辛酸。我正与此同，百忧双鬓残。东归忽十载，四忝侍祠官。虽云幸得饱，早夜不敢安。乃知学者心，羞愧甚饥寒。读我病雁篇，万钟均一箪。”由此可见诗人的自尊心之强。也让人感到文人的可悲地位，不得不由政府养着，本来是有付出有获得，可在传统中国，一切都是皇上赐予，知识分子无田地，只能凭入仕领禄，一旦退出仕途，就不能理直气壮要求生活保障，而是提心吊胆、低声下气去请求奉祠。陆游已经两度再请奉祠，无功受禄心中不安，这种难堪的感觉已折磨了他很久，现在他辞去半俸，物质上匮乏了，精神上却解脱了。

南宋由于官僚阶层的奢侈腐化和沉重的岁贡、军费等原因，使得财政枯竭，于是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大受影响。陆游一家并非大富，绝禄以后更是难以维持。“两年失微禄，始觉困羁旅。倾身营薪米，得食已过午。”陆游对农村人民的处境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同情，他有时也参加劳动，认为“树桑酿酒蓄鸡豚，是中端有王业存”。而不像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体力劳动。他也不鄙视农民，与村民关系融洽，“东邻稻上场，劳之一壶酒；西邻女受聘，贺之以一襦。”在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交往中，他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融融乐趣。当地人也喜欢这位平易近人的大诗人，走到一地，总有“村妇窥篱看，山翁拂席迎，市朝那有此，一慰笑平生”。被认同、被欣赏、被重视、被美赞、被另眼相看是人的一种精神需要，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与满足，而在下层人民间，在淳朴的山里人间，诗人更能得到这种快乐与满足，所以他由衷地说“一

慰笑平生”。

陆游用他的诗笔对农民在重敛厚赋逼迫下的惨境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如《邻曲有米饭被追入郭者，悯然有作》：“春得香秔摘绿葵，县符急急不容炊。君王日御金华殿，谁诵周家《七月诗》。”又如《夜闻蟋蟀》：“布谷布谷解劝耕，蟋蟀蟋蟀能促织。州符县帖无已时，劝农促织知何益？”这首诗指出了农民生活艰难的根源是政令害民、吏治不清。农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陆游在《赛神曲》中通过老巫的口说了出来：“愿神来享常欢娱，使我嘉谷收连车。牛羊暮归塞门洞，鸡鹜一母生百雏。岁岁赐粟，年年蠲租。蒲鞭不施，圜丘空虚。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为吏无文书。”社会当然不能没有政府和官吏，束草作官、刻木为吏反应了小农业生产者的狭隘意识，但农民们之所以有这个愿望，是因为官吏不为民作主，反而扰民害民，因此成为农民的对立面，为民所厌所恨。

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对付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低下，社会不公便会将许多贫困家庭逼入绝境。“甲第朱门漫豪侈”，与此相应的便是“空垣破灶逃租屋”。贫富分化的极点便是饥民暴动：“富豪役千奴，贫老无雨帛。困穷礼义废，盗贼起蹙迫。”陆游看到了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在同情下层人民的同时对国事怀着深深的私忧。而这给他的诗歌带来了现实的内容和较为深刻的思想性。

陆游远离朝廷，不能参予大政，更加为国事担忧。金朝方面，自金章宗完颜璟即位以来，政治腐败，政局不稳。庆元五年，金朝变乱的消息不断传来，“得建业倅郑觉民书言虜乱，自淮以北，民苦征调，皆望王师之至。”而朝廷根本没有

出师的意思。陆游悲愤地说：“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陆游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宋的苟安不是因为秦桧一人的卖国投降，而是有一大批只顾自身安危的当权者。他们不仅不想有所进取，甚至已经忘了国耻。对泣无人，哀莫大于心死，这不能不让陆游绝望。当然，像陆游这样忧国忧民的人还是不少的，只是没有得到有利的位置和机会而已。陆游想到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痛心疾首地写道：“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多么壮丽的河山，却沦陷于异邦之手，那里的人民盼了一年又一年，眼泪都要流干了，可南宋小朝廷官僚们有几个能像陆游这样设身处地地想到遗民的苦盼呢？陆游不禁纵笔讴歌宗泽、岳飞等抗金名将，“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而恨不得自己能够为民赴命：“老死已无日，功名犹自期。清笳太行路，何日出王师？”他已经自觉有心无力了，然而，国事又出现新的转机，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新的希望与失望

绍熙五年（1194年），南宋朝中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光宗赵惇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昏庸而惧内的皇帝。李后悍妒无知，与已退位的赵昚因几次言语误会而不睦，对太上皇怀有极大恶感。赵惇受制于李后，对赵昚极为冷淡，赵昚病危时不去问候，赵昚去世后甚至称疾不肯居丧。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朝臣微议很多。赵汝愚等便委托太子赵扩之妻韩氏的叔父韩侂胄进宫见赵构孀妻吴后，以她的名义改立赵扩为帝，尊赵惇为太上皇。赵扩即宁宗，改元庆元，拜赵汝愚为右丞相。韩侂胄因定策之功很得赵扩信任，又凭外戚关系出入两宫，植党营私，弄权用事，先后将赵汝愚及弹劾他“擅权害政”的朱熹罢斥。又将朱熹的理学说成是伪学，诬指他们以研究理学为幌子，招集徒众，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结果赵汝愚以“伪学罪首”充军，暴死湖南衡阳道中。朱熹被指为“伪学之魁”，周必大被诬为“以身为伪学标准”，其门下五十余人被公布为“伪学逆党”，限制活动，禁止进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陆游对新皇帝是支持的，并对他寄托了一些希望。但陆游对党禁风波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内讧，会误国家大计。但

是，韩侂胄为了“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利用人民渴望恢复的心理，筹谋北伐，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不管其动机如何，其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能因为韩侂胄害国的一面而否定他利国的一面，更不能因为他个人品行、动机方面的疑问而否定他实际行为上的正确。庆元元年八月，韩侂胄“诏内外诸军主帅条奏武备边防之策以闻”，十二月，置楚州弩手效用军，积极备战。同时起用一些知名的抗战派人物。陆游曾为赵汝愚所驳，所以不在“伪党”之列，韩侂胄网罗天下名士，自然不会疏忽陆游。陆游对韩侂胄北伐是支持的，并且跃跃欲试。庆元五年韩侂胄筑南国，请杨万里作记，并许之以官。杨万里说：“官可弃，记不可作。”并劝陆勿与韩来往，勿热恋做官而依附之。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节操和骨气有时比生命还重要，这种信念的坚定，有时到了执泥、迂腐的地步，为了它，甚至不顾现实利害，不顾身家性命，不顾大局。这既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们的可悲之处。韩侂胄改属陆游，陆游为作《南园记》，被杨万里、朱熹等视为失节行为。朱说陆“迹太近，能太高，或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庆元六年三月，韩侂胄任命陆游直文华阁，恩赐紫龟，仍致仕。陆游有“已挂朝衣神武门，暂纡紫授拜君恩”之句，更引起朱熹不满，甚至绝了彼此之间的文字交。由于朱熹代表儒林正统，所以陆游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死后多年一直因此受到非议。其实，韩朱之争，本无绝对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附庸权臣与效忠君主并无本质区别，只要不为虎作伥，即是委屈逢迎，也无大过，何必作无谓的对抗而不明哲保身呢？每一个有骨气有节操的文人都不免向皇帝高

官三叩九拜，但他们有时又视叩拜包括言辞上的叩拜为卑微屈节行为，所以对“天子来呼不下船”和“笑傲王侯”的风采羡慕不已。除非不入仕，又有几个文人士大夫能不服从那个时代的规矩？陆游为韩作记，即使是妥协，是逢迎，也没什么奇怪。何况韩并非罪大恶极，何况他在记中是极赞韩侂胄有其祖忠献公韩琦之志而不是一味阿谀。陆游在记中说：“游窃伏思公之门，才杰所萃也，而顾以属游者，岂谓其愚且老，又已挂衣冠而去，则庶几其无谀辞，无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欤？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获辞也。”这种推测显然是有道理的，韩侂胄请依附他的人作记，必然只是逢迎之辞，陆游已不在仕途，就可以作一篇合情合景合韩氏心志的文章，而事实上陆游的《南园记》也确实是有文采、内容充实的。假如韩氏没有这种想法，那么陆游这么推测，等于是加其志于韩氏，让韩氏惶惶之余受到鞭策，这又何乐不为呢？另外，当时支持韩的还有刘过、欧阳丞、辛弃疾等名士，陆游为韩作记决不至成为其污点，而只是当时臧否人物的观念太偏颇。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误区是：看人的性格、心术，不看人的行为结果，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功过品高下。只要有好心或出于好心，即使对个人对国家有所不良影响也充满理解和同情，其实人心难测，谁知一个人真心真性如何？只能以其结果来给予他以肯定或否定。心再好，没做出实事也无用，心术再不正，没有危害他人和国家也不能治其罪。失败的英雄，从他努力过来说应该肯定，但他毕竟失败了，没有实际的功绩，所以不配为英雄。中国文化人基本上都是失败和失意的角色，所以他们对失败的英雄充满同情甚至给予过多的谅解

和肯定，他们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给中国传统文化添加了一些消极没落的东西，迎合人心中软弱惰性的一面，中国国民性之软弱自欺自慰与此莫不相关。无所作为的正人君子、道德大家，没有实际的贡献，也不配青史留名，韩侂胄北伐固然出于个人目的，但有几个忧国忧民的人在为天下大计努力时没有自觉或不自觉的私念呢？只是未表露未为人所知，或者他没有让人不以为然的心性和某些小节上的疑点而已。当然，现在对韩、对陆的历史评价已经公允多了，能从其实际行为、结果来盖棺论定，但今天对今人的评价，比如对现代名人、当代名人包括某些公认的有过错、有失节、误国行为、有野心或别的不正心术的名人的评价，仍然是存在许多偏颇之处的。

陆游虽然为朱熹所误会，但他并不在意，仍与之往来。朱熹死后，陆游作《祭朱元晦侍讲文》，饱含痛惜怀念之情。他与周必大也有书信来往。陆游的心思只在个人功业和国家大事上，有这方面的得失荣誉之虑，而不在意人际的恩怨纷争，也没有什么执泥的信念和顽固的立场。

庆元六年，七十六岁高龄的陆游被朝廷提升为直华文阁，并赐紫金鱼袋。这是对老臣的一种礼遇。陆游心情是愉快的。但他还是忧挂着国家大事。他在诗中说：“丽谯听尽短长更，幽梦无端故不成。寒雨似从心上滴，孤灯偏向枕边明。读书有味身忘老，报国无期涕每倾。敢为衰残便虚死，誓先邻曲学春耕。”作为诗人，因为考虑到作品会传诸他人及后世的缘故，当然会有意无意地美化自己的思想，但他至少是还有这些思想的，而一旦有机会就会转化为行动。

嘉泰二年（1202年），韩侂胄为收买人心，缓和矛盾，并准备北伐起见，解除党禁，追复赵汝愚资政殿学士、朱熹焕章阁待制、致仕，复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其他党人也先后复官，又削荐牍中“不系伪学”一节。在这种形势下，陆游欣然应召出仕，任中大夫、直华文阁、提举祐神观、兼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主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朝廷照顾他年老，特许免奉朝请。

陆游到临安后住在六官宅，他将临时的书斋称作“老学行庵”。儿子子聿随侍在侧。陆游修史，才得其用，又受到尊重，心情较好。但是年事已高，常常想家，也无力再参予国家大计的画策，所以决定用九个月时间修完史书即还故乡。在为韩侂胄作的《阅古泉记》中，他说：“游按泉之壁，有唐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八分书题名，盖此泉湮伏弗耀者几四百年，公乃复发之。时阅古盖行忠献王以名堂者，则泉可谓荣矣。游起于告老之后，视道士为有愧，其视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复归故山，幅巾短褐，从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赋之。”陆游已经告老致仕，而又不甘寂寞重新出山，不仅怕被他人视为贪恋富贵，自己也不免自疑。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最是欣赏激流勇退的风度，而并不怎么欣赏老骥伏枥的精神。所以陆游心中有愧。杨万里曾作诗讽斥陆游的再次出仕：“衫短枯荷叶，墙高过笋舆。人生须富贵，富贵竟何如？”谓陆游没有屈原那样以荷叶为衣衫的高洁心性，热恋仕途，贪恋富贵。陆游的天性是热情充沛、积极参予的，现在却不能不顾忌人言，想赶紧做完一些事及早退身。其实，他作的《南唐史》言简意赅，不愧是大家手笔，堪称史中名著。老来发挥余热，是

作学问方面的工作，也不是陷于政治漩涡，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陆游身兼数任，十二月又加秘书监之衔，真可谓“恩光集晚途”，但他在朝中仍是局外人，没有机会也没有精力参予大计。他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退场谢幕了。“六十年间几来往，都人谁解记放翁？”被遗弃的寂寞感让他面对繁华喧嚣的人世百感交集。

陆游以局外人的眼光看朝廷状况，有许多不满之处。都城权贵豪奢相竞，醉生梦死，不能不让他感叹。但他不愿多言，也知道多言无益，自讨没趣而已，只是忧心不已。

嘉泰三年四月，陆游与傅伯寿合作修成孝宗、光宗实录共六百卷，进书后，升宝谟阁待制，上章乞致仕，又授太中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五月出都还乡，作诗一首：“门巷如秋爽，轩窗抵海宽。初带授若若，已觉面团团。引睡拈书卷，偷闲把钓竿。人生快意事，五月出长安。”

当时韩侂胄正聚财募兵，制造战舰，加快北伐进程。陆游在此时归山，可见他确实老了，再也不想投身时代洪流。“老入鸕行方彻悟，一官何处不徒劳？”他以老人的眼光回首前尘，油然而生空幻的感觉。“天公赋予谁能测，只吝功名不吝诗。”他终于认识到此身合是诗人，只能立言不能立功。而他却为功名之念焦虑奔波了数十年。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这么多纷繁而实在的人生杂念和凌乱行迹，又何来他的诗情、诗兴呢？所以不是他命中注定为诗人，而是命运促使他成为诗人。

绝 唱

陆游回到山阴后，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考虑，他主张出兵，其《感愤》一诗充满了慷慨悲歌之气：“形胜崑潼在，英豪赵魏多。精兵连六郡，要地控三河。慷慨鸿门志，悲伤易水歌。几人怀此志，送老一渔蓑。”但从他个人的立场，却主张退缩。在《杂言示子聿》一诗中，他表达了消极遁世的意思：“福莫大于不材之木，祸莫惨于自跃之金。鹤生于野兮何有于轩，桐爨则已兮岂慕为琴。古今共戒玉自献，卷舒要似云无心。庐室但取蔽风雨，衣食过足岂所钦。我今余年忽八十，归耕幸得安山林。逢人虽叹种种发，人塾尚忆青青衿。吾儿殆可守绝学，相与竭力穷幽深。”

嘉泰三年夏，辛弃疾为浙东安抚使，兼知绍兴府。他看到陆游的居所过于简陋，想代陆游盖新宅，为陆游谢绝。次年春，辛弃疾奉召入都，陆游作诗相送：“稼轩落笔凌鲍谢，退避声名称学稼。十年高卧不出门，参透南宗牧牛话。功名固是券内事，且葺园庐了婚嫁。千篇昌谷诗满囊，万卷邨侯书插架，忽然起冠东诸侯，黄旗皂纛从天下。圣朝仄席意未快，尺一东来烦促驾。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天山挂旆或少须，先挽银河洗嵩华。中原麟凤争自奋，残虏犬

羊何足吓。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古来立事戒轻发，往往逸夫出乘罅。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辛弃疾曾以五十骑突袭济州缚叛徒张安国而归，英雄举止盛传一时。其词格调高昂，气冲斗牛，陆游对他非常羡慕。这首诗以充沛的激情、轩昂的气势写出了辛弃疾的英雄本色和在豪放词方面的宏伟成就，既如描写对象其人，亦显出创作主体的浩然胸臆。末句劝勉辛弃疾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更见其长者风度和挚友情怀。

开禧元年（1205年）五月，韩侂胄追封岳飞为鄂王，次年降申王秦桧为卫国公。在降封秦桧的制词中说：“兵于五材，谁能去之，首弛边疆之备，臣无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又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这些话，大大鼓舞了军心民心。秦桧和岳飞，分别是主和卖国和主战爱国派的代表，这一降一封，表明了南宋作战的决心。

四月间战争爆发，宋军连取泗州、新息、褒信等地。陆游得邸报后，有诗一首：“六圣涵濡寿域民，耄年肝胆尚轮囷。难求壮志白羽箭，且岸先生乌角巾。幽俗主盟猿鹤社，扁舟自适水云身。却看长剑空三叹，上蔡临淮捷奏频。”他既为战争的初步胜利而喜，又为自己的不能效力而忧。在给曾几奏稿写的跋中，他说：“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后四十七年，先生曾孙黯以当日疏稿示某。于今某年过八十，仕忝近列，又方王师讨残虏时，乃不能以尘露求补山海，真先

生之罪人也。”从这段感情深挚的话里，可以看出陆游的忧国之心是真诚的。

战争继续进行，南宋将官的无能、军力的衰弱很快显示出来。尽管金朝在蒙古侵扰下大伤元气，可对宋作战还是保持了优势，很快反败为胜。南宋北伐军田俊迈部败退，田被俘，其上司郭倬逃走。毕再遇部溃敌之后退守泗州。皇甫斌部、秦世辅部、王大节部均败。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投降，被金封蜀王。西南动摇。金兵分九路南侵，攻陷枣阳、安丰、濠州（今安徽凤阳）等地。宋廷震动，韩侂胄动摇，和议之说又起。

以当时宋金实力而言，南宋如果重用有能力的将领，坚持到底，最后的结果还是很难预料的。也许会有很大的牺牲，但决不至完败，而只是俱伤而已。田侯琳、毕再遇、叶适等部都取得了胜利，吴曦也为杨巨源、李好义等部所诛。可是，南宋政府却没有信心和决心，以杨皇后、史弥远为首的一帮人谋杀了韩侂胄，与金谋和，签订了屈辱的《开禧和议》。而他们不过是出于对韩专权不满。宁愿对外屈服，也不忘内争，这似乎是汉民族、汉政权一脉相承的劣性。韩侂胄的首级被送到金国，金国以“侂胄之忠于本国”，谥为忠缪侯，礼葬于其祖韩琦墓侧。这对南宋那些只顾私利误国卖忠的人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陆游之子子礧在北伐时任淮西濠州通判，在前线参加战斗。陆游极力支持：“吾侪虽益老，忠义传子孙。”可是战争失败了，陆游仍不得不作为一个失败、屈辱的民族之一员而终老林泉。不仅如此，因为他曾为韩侂胄作记，韩被诛，支

持韩氏用兵的叶适、“言辛弃疾迎合开边”的倪思、首论用兵的进士毛自知、和陆游同修实录的傅伯寿纷纷被贬，闲居的陆游也逃不过处罚。嘉定元年（1208年），他的半俸被剥夺，次年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也被劾落。陆游在韩侂胄当政时出山，其子因而得官，这种恩典，即非韩当权也可能会有，可现在被时人讥为“山林之兴方适，已遂挂冠，子孙之累未忘，胡为改节？”元人戴表元为之辩说：“余早闻好事者说，谓放翁晚岁食贫，牵于幼子之累，赖以文字取妍韩氏，遂得近臣恩数，遍官诸子。此说既行，而凡异时不乐于放翁之进与忌其文辞者，同为一舌以排之。至于死且百年，同时争名逐角之人，亦已俱尽，宜有定论，而犹未止，盖其事可伤悲焉。渡江以来如放翁，可谓问学行义人矣。谥其放陋而不伤，困窳而能肆，不可谓无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见，欲为身谋，为子孙谋，当盛年时知己如麻，何待七八十岁之后，始媚一戚里权幸而为之邪？”韩侂胄不可谓无过，但时人对他的非议有很多是出于个人恩怨以及道学家、腐儒的偏见，陆游因之也蒙受了上百年的非议。在中国作名人难，是因为难逃各种偏见和苛求。

陆游家产本不丰厚，停俸之后，更是拮据。“判愁停赏酒，忍病罢迎医。”但他对停俸充满不屑：“力请还山又几年，何功月费水衡钱，君恩深厚犹惭惧，敢向他人更乞怜？俸券新同废纸收，迎宾仅有一絺裘。日锄幽圃君无笑，犹胜墙东学儉牛。”

陆游晚年的生活，基本上还是平静自足的。作诗是他的日常功课，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浮思、夜梦等等无

不入诗。陆游在严州刻诗稿时作品有二千五百首，此后二十余年有诗六千余首，创作之丰让人咋舌。从诗歌艺术本身来说，这种漫无止境、缺乏提炼的创作自然价值不高，但它作为诗人终身的寄托，作为他遣兴、抒怀、泄愤、解忧、道乐、记事、说理、应酬等等的方式，对于诗人是必不可少的，在诗人一生中有了足够的意义，他何必去顾及后世的评价呢？再者，古今许多名人的日记作为其心路历程的记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陆游之诗可谓诗体日记，在诗歌作为文学主流的时代，以诗体记日记和今人以散文方式记日记又有什么区别？而他作为名人，有思想、有才华、有历史影响的大诗人，其诗体日记自然是研究其人及其时代的珍贵资料，并有其他方面的种种价值。另外，其中佳作名句也不鲜见，如星星布于天幕。他那首年代不详的《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以梅写人，将诗人为世所忌、孤苦飘零的处境和笑傲红尘、独立自主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切感人，让古今多少失意才子、落魄文人以及一切在滚滚红尘逃脱不了喧嚣与骚动、灵魂躁动不安的人们为之心折！

陆游晚年旧友多已故去，但他结交了一些新的诗友，尽力扶持、指点他们。“老来多新知，英彦张可喜。”很多青年诗人来求教，使他忙到“以文章来者积架上不能省”的程度。

陆游对农家生活有时不满其贫穷，有时又欣赏其恬淡。《不如茅屋底》一诗说：“铸印大如斗，佩剑长拄颐，不如茅屋底，睡到日高时。南伐踰铜柱，西征出玉关，不如茅屋底，

高枕看青山。火齐堆盘起，珊瑚列库藏，不如茅屋底，父子事耕桑。列鼎宾筵盛，笼坊从骑都，不如茅屋底，醉倒唤儿扶。”这只能视为文人的戏作，是一时的心情，不必太认真深究。

嘉定二年立秋陆游得膈上疾，冬天转剧，腊月底病逝，他晚年有三大遗憾：一是与唐婉未能一生相守，始终不能忘怀。诗人八十二岁时还作诗怀唐婉，临死想必也还记起。二是没能实现少时壮志，没有显赫的功绩。至于文学上的成就没有给生前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只是虚幻的声名安慰，他是不能满足的。文学成为一种事业、一种谋生和谋取立世资本的手段是现代的事，在传统中国它不过是一种雅趣、一种逸兴、一种精神需要。况且不到盖棺论定，他也无以自信其成文学成就。总之立功是每个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孜孜不倦、至死不渝的追求，而陆游却没有得到，所以他总是怅然若失。他的不能立功与当时南宋的普遍颓败、软弱有关，所以他把个人的失意转化为对国事的失望与不满，把个人功名不就的缺憾转化为国土不哀的遗恨。因此，忧己忧民忧国的诗人，在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发出了最后一声悲叹，表达了最后一丝心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人在生命之旅的终点，完全抛却了小我的得失成败，在清醒地意识到万事皆空之后，独对国家前途念念不忘。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个人的荣辱乖顺终没有多大意义。覆巢之下无完卵，几十年后南宋为蒙古所灭，那些为一己私利碌碌忙忙、赢得虚名浮利的人，岂不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陆游将小我升华为大我，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

首千古流传的绝唱，八百年来一直深深激动和鼓舞着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从中获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自强不息，前赴后继，在为国家和民族贡献、牺牲的同时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

陆游传世的作品有《剑南诗稿》八十五卷计九千二百二十首。《渭南文集》五十卷（内包括《天彭牡丹谱》，《入蜀记》六卷，《词二卷》）；《放翁逸稿》二卷（明毛晋辑）、《老学庵笔记》十卷。此外尚有一些残稿和伪托之作。陆游以诗著名，但他也是个大文学家。他的散文、应用文都写得非常出色，史笔也极佳妙。

后世对于陆游的研究，元朝较少，明清甚多，现当代基本上依袭前人的一些论点，没有太多深入研究。对陆游其人的评价元朝基本上是不同意南宋理学家对陆游的偏见。清朝人更是极赞其爱国主义精神。如梁启超读《陆放翁集》后有诗两首：“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又：“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今人心目中的陆游也是一位爱国主义歌手。关于陆游的文学史地位，或曰“绝是苏黄一辈诗”，或曰“在高、岑之间，虽不及苏、欧，自余宋人，举其无敌”，或曰“苏胜于陆”，或曰“陆实胜于苏”。今天看来，他是比李白、杜甫、苏轼略逊一辈的一流诗人。这种比较并不重要，而且在很多方面往往没有可比性，只是各有千秋。对于其诗歌艺术，赞之者说“放翁记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模写事情俱脱透，品题花鸟亦清奇”，“从至性至情流出，不求超脱而

自超脱，不求精工而自精工。”“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嚼”，“剑南最工七言律，七言绝句。略分三种：雄健者不空；隽异者不涩；新颖者不纤。”贬之者说“剑南诗非不佳，只是蹊径太熟，章法句法未免雷同，不耐多看。”“子瞻、鲁直、放翁，一泻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诗也。”袁枚更为刻薄，在《人老莫作诗》中说：“莺老莫调舌，人老莫作诗。往往精神衰，重复多繁词。”陆游的记梦诗多达九十余首，对于这一个特殊文学现象，赵翼解释说：“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梦矣。”陆游词作不多，评价却很高。刘克庄《后村诗话》中评道：“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种种评论虽然有对立之处，但从不同角度指出了陆游诗词艺术的成就与不足，达到了总体上的全面、中肯。

有关陆游的传记，除《宋史·陆游传》外，今有朱东润先生和郭光先生各自所作的《陆游传》，前者略带文学性，不避陆游的私念和缺点，既把陆游看作爱国主义战士，也看到他更是一个诗人；后者考证严密，比较看重陆游作为战士在当世的作用。另有一些属于文学普及读物的小传，没有什么新材料和新观点。